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崛起：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分析

How Do Japanese View the Rise of China:

An Analysis of Asian Barometer Survey

劉靜一

Ching-Yi Liu

指導教授：張佑宗 博士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July, 2019

# 謝辭



能夠從政治所順利畢業，一路上要感謝的人太多。從日文系到政治所，轉換領域進修不免遇到些許難以銜接的障礙。過程雖然有不少辛苦，但仍然十分慶幸自己當初所做的選擇。從文學院到社科院的學習，無論是相同或是相異的知識觀點，都造就了現在自己認識世界的不同面向。

在研究上，首先要感謝指導老師，不僅在研究上給予指導，也在許多方面給予照顧。謝謝張佑宗老師帶領我進入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也感謝在東亞遇見的所有人。謝謝東亞的學長姐總是很願意給予各種研究和行政上的協助，讓自己在許多方面獲得莫大幫助。在碩二暑假剛好遇上第五波台灣調查，感謝跟自己一同經歷訪問調查的所有人。訪問調查過程中，遇到許多過去未曾想過的事，獲得許多成長機會，為研究所生活寫下難忘的一頁。

論文上，除了指導老師，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謝謝廖小娟老師和林超琦老師，針對論文給予許多實質且寶貴的意見。從論文大綱到最終口試，感謝兩位老師認真給予批評指教，為論文修改提供方向。即便論文有許多不足之處，感謝老師們仍然願意細心指導。

關於研究所生活，想要感謝 R05 的大家，以及從 621 到 615 的所有研究室夥伴。在研究所許多徬徨的時刻，因為有著一起崩潰的大家而獲得許多溫暖。謝謝交換生活期間遇到的朋友們，讓獨自一人在海外的生活少了一點難。無論是在研究所的任何片段一起走過一段路的人，都是自己想要感謝的人。缺少任何一個人的支持與幫忙，自己就無法走到現在這一刻。謝謝路途上每一位願意伸出援手的人，讓我體認到自己是擁有很多幸運的人。

最後，想要感謝最親愛的家人。謝謝家人包容我的各種任性，無條件支持我選擇政治所以及交換留學的決定。感謝家裡的幫忙，讓我有機會選擇自己的興趣，甚至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做出許多嘗試。謝謝走過的每一段路，謝謝一起走過的人，謝謝走到此刻的自己。

2019年6月

於日本東京

# 中文摘要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國崛起的軟實力環境廣泛受到研究者討論。本文以此為研究背景，並在延續既有文獻的基礎上，針對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視角開展全文之研究。在影響認知的因素中，本文以兩岸關係感性認同和經濟理性的分析框架為借鏡，歸結出政治體制認知、經濟評估，以及民族主義傾向三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中，本文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為研究資料來源。固然受限於問卷設計為適用於跨國之間的比較研究，而難以完全貼近日本本身的情況，但仍然在實證結果中有部份進展。經由實證分析結果可知，認知中國民主程度、經濟前景評估和民族主義傾向皆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中有所影響，只是程度大小有所不同。日本人雖然整體而言負面看待中國崛起，但其內部仍然有所差異，而教育程度高低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由兩岸關係相關研究所得出的分析框架，置於中日關係之下同樣適用。經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對於政治體制差異的不信任和經濟利益因素，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面向上扮演重要角色。

關鍵詞：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中日關係、軟實力、認知

# 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ise,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thesis focuses on how Japanese view the rise of China. There are many cognitive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 have learned that identity and expected economic benefits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Taiwanese vote choices. Based on it, this thesis takes the perceived democratic level of China, economic evaluations, and the nationalism a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how Japanese view the rise of China. As an empirical study,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data from the Asia Barometer Survey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problem. Because the Asia Barometer Survey is a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 the design of the questionnaire could not fit this thesis very well, but we still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The research shows how the perceived democratic level of China, economic evaluations, and the nationalism influence the way Japanese view the rise of China with different level. Although the Japanese generally view China's rise negatively,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within i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factor which cause the differences.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which is learned from the research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uld also apply to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erceived democratic level of China and economic evalu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ow Japanese view the rise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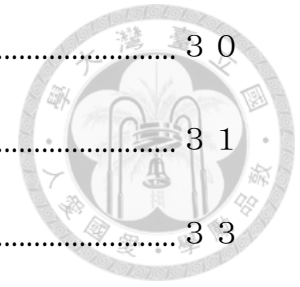
Key words: China's Ris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oft Power, Cognition

# 目錄



口委審定書 .....	II
謝辭 .....	III
中文摘要 .....	V
Abstract .....	VI
目錄 .....	VII
圖目錄 .....	IX
表目錄 .....	X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6
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方法 .....	14
第四節 章節安排 .....	15
第二章 研究假設 .....	16
第一節 國際關係中的影響認知因素 .....	16
第二節 中日關係中的體制差異因素 .....	22
第三節 中日關係中的經濟因素 .....	25
第四節 中日關係中的民族主義因素 .....	27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 0
第一節 研究資料.....	3 1
第二節 變項說明.....	3 3
第三節 統計方法.....	3 9
第四章 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	4 0
第一節 敘述統計.....	4 1
第二節 單變數關係與迴歸模型 .....	4 4
第三節 結果討論與深入分析 .....	4 9
第五章 結論 .....	5 8
第一節 中日關係的未來.....	5 9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6 2
參考文獻.....	6 4
A. 附錄.....	7 5



# 圖目錄



圖 1-1：1978-2017 年日本人民對中親近感變化	4
圖 1-2：2017 年日本人民不親近感	5
圖 2-1：日本人民對於民主正當性的看法	23
圖 4-1：日本人民對於中國影響日本的正負面認知變化	40
圖 4-2：年齡分佈	41
圖 4-3：日本人民認知和預期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43
圖 4-4：日本人民評估中國和美國對日本影響	44



# 表目錄



表 4-1：性別分佈	42
表 4-2：城鄉人口分佈	42
表 4-3：教育程度分佈	42
表 4-4：政黨傾向分佈	42
表 4-5：中國對日本影響認知的相關性分析	45
表 4-6：美國對日本影響認知的相關性分析	45
表 4-7：邏輯斯迴歸模型	47
表 4-8：邏輯斯迴歸模型	48
表 A-1：日本人民認知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76
表 A-2：日本人民評估中國對日本影響	76
表 A-3：日本人民預期十年後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76
表 A-4：性別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77
表 A-5：性別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78
表 A-6：年齡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79

表 A-7：年齡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79
表 A-8：教育程度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80
表 A-9：教育程度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81
表 A-10：政黨傾向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82
表 A-11：政黨傾向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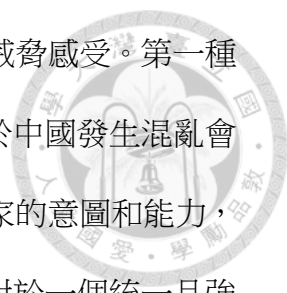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為緒論，論述本研究與既有研究的關聯之處以及全文將如何展開。全章分為四小節，第一節闡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回顧既有相關文獻，第三節為研究資料與方法，第四節則為章節安排。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崛起，是近年來在國際關係領域最常被提及的國際環境變化。隨著中國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成長，中國和日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備受研究者關注。自 1972 年中日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以來，曾經歷短暫蜜月期，在此之後雙邊關係大致呈現一路走下坡的狀態。1979 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經濟力提升，九〇年代後更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驚人速度成長。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隨著經濟成長帶來民眾生活的顯著改善。與此同時，綜合國力提升的中國漸漸加入區域和全球經濟體系，並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日本而言，雖然中國的經濟崛起同時帶動日本經濟成長，然而軍事和政治力量的增強卻動搖了日本在區域的影響力。一直以來在國內生產總值上遙遙領先的日本，於 2010 年正式被中國超越，其後中日之間經濟力差距不斷隨著中國成長而被拉大。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之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所謂的「中國威脅論」。(Wu Xinbo, 2000：296；趙建民、何思慎，2004：88；劉泰廷、洪銘德，2011：43；蘇俊斌，2012：16)



一般而言，在論述「中國威脅」時，主要包含兩種面向的威脅感受。第一種源於中國整體實力的增強所衍生出的不安，第二種則是來自對於中國發生混亂會帶來不穩定的擔憂。針對第一種威脅感，必須考慮造成威脅國家的意圖和能力，其中又包含政治和經濟等不同層面。而第二種威脅感，則是相對於一個統一且強大的中國，一個分裂而弱化的中國同時也可能對於周邊國家的日本產生外溢效果。（天兒慧，1997：6-13）由日本面對中國的複雜視角，可以看出日本作為亞洲鄰邦，有著與美國截然不同的觀點。

「中國威脅論」主要出現在美國學界和日本學界，而此種威脅論述的含義相當廣泛。從意識形態差異、生態環境破壞、政治體制對立、經濟利益衝突，到日常民生用品疑慮，甚至是國際軍備競賽等等，中國崛起的背景在各方面引起了以美國和日本學界為首所主張的中國威脅論述。一般認為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始於1990年村井友秀在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而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則始於1992年美國費城外交研究所的主張和杭廷頓的著作等等。美國的中國威脅論述，可以粗略分成關注權力的現實主義模式，以及注重意識形態的理念主義模式。相對於美國以世界霸主的角色定位來認知崛起中國的挑戰，日本與中國有長久以來的歷史互動脈絡，因而夾雜更多政治性甚至情緒性的觀點。由此可知，出現時間點早以及內涵特殊性高，兩方面凸顯了日本式中國威脅論述的研究價值。（邵軒磊，2012：86-90）

另外，由中國威脅的論述可知，認知因素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之中，對於認知因素有不同的解讀。新現實主義關注國家生存與安全，其對於認知的假設主要以實力為判斷標準。對既有強權而言，崛起強權實力的增長便是威脅。新自由主義對於認知的假設，與新現實主義沒有太大差異。相對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偏重物質因素的解釋，建構主義的興起重新

將認知因素帶回國際關係的討論之中。然而，建構主義雖然提出觀念重要性，與前述兩者有所區別，卻較難在實證上提出相對應的證據。為了呈現國際政治中的認知因素，觀感的測量和理解顯得相當重要。

關於日本一般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根據日本內閣府所實施的外交輿論調查可以掌握大致的趨勢。由圖 1-1 可知，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時，日本人民對於中國的親近感超過六成。八〇年代初期被譽為中日關係蜜月期，對中親近感普遍超過七成。第一次劇烈變化的時間點，是在 1989 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驟降為五成。1996 年時，首次出現對中不親近感高於對中親近感的比例。自 2004 年起，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正負面觀感比例出現明顯高低差距。2010 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後，對中不親近感再一次急遽升高。除了 2010 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外，2012 年日本國有化釣魚臺以及 2013 年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皆加劇中日之間的軍事外交衝突。由圖 1-1 可知，在 2010 年之後，日本人民對中不親近感皆在七成以上，甚至高達八成。2014 年日本內閣法政局同意修改對日本憲法解釋，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其後，2015 年日本據此修改相關安保法制。這一系列作為和外交互動，皆為東亞區域國際關係增添許多不確定性。

在中日之間緊張關係升高的情況下，日本人民對於中國的負面情感越來越深。根據日本內閣府的外交輿論調查，2017 年對中抱持親近感的比例為 18.7%，不親近感的比例則為 78.5%。此外，認為目前中日關係良好的比例為 14.9%，不良的比例則為 79.8%。不論何者皆可以看出，對於日本人而言中日兩國的關係稱不上友好狀態。固然 2017 年相較於前一年度認為不良的比例已經略為下降，但仍然可以看出日本人對中不親近感和認為中日關係不良的比例相當高。

此外，由圖 1-2 可知，在該調查中，日本人對中國、美國、俄羅斯等主要國家地區的感受，尤其以對中國的不親近感（78.5%）程度最高。



圖 1-1：1978-2017 年日本人民對中親近感變化

（筆者製圖。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除了從日本角度出發，日本人對中國的負面感受高過其他國家，以同時考慮各國看待中國的角度而言，同樣可以發現日本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特殊性。

Yun-han Chu 和 Yu-tzung Chang 於 2017 年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第三波和第四波的調查資料為基礎，發表對於東亞地區人民的認知研究。在該研究中，呈現了東亞地區民眾對於美國和中國兩大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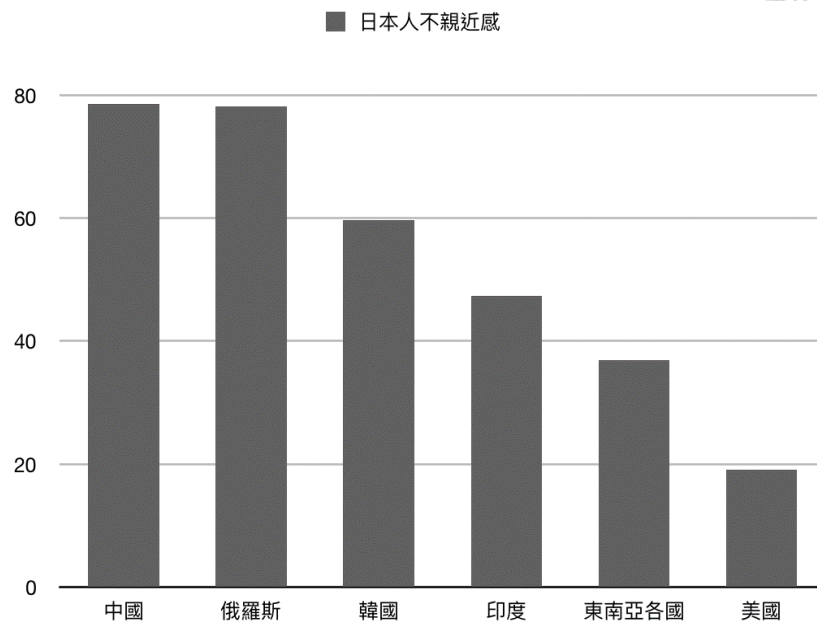


圖 1-2：2017 年日本人民不親近感

(筆者製圖。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權的認知。之所以針對中美兩國，主要原因在於美國作為東亞地區既有的強權，而崛起中國挑戰了美國在此一地區的主導性角色，因而形成既有強權和新興強權的對比。在東亞十四個國家地區當中，日本是對於中國區域正面影響認知最低的國家。除了論及日本和中國由於歷史因素所導致的負面觀感之外，對於日本內部不同人民對於中國有何種看法，缺乏完整的論述和研究。因此，本文欲延續該項東亞人民認知的研究，針對日本人對中觀感進行分析。如前所述，《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卷設計框架以中美兩國相比較的觀點出發，試圖捕捉各國人民對於爭奪東亞地區主導性角色的美國和中國有何種看法。作為同樣資料的後續研究，本研究同樣以對中美兩國認知比較的方式進行日本人觀點的分析。

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以一衣帶水加以形容是常見的說法，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兩國之間相互關係的緊密程度。地理上距離相近的二國，有著長遠的歷史互動

過程。以當前的東亞區域秩序而言，中國和日本無疑是重要的行為者。中日關係的穩定與否，對於區域和平穩定具備關鍵性影響力。而國家內部人民的想法，作為兩國建立互信互賴關係的基石，是中日關係研究當中必須加以考量的面向。

另外，在民主國家，由於選舉的壓力，政府決策時必須考量大眾的意見。因此，在理解一國外交政策時，該國人民想法自然是不可忽視的一環。（S. B. Hobolt & R. Klemmensen, 2005：379-380）在全球化時代之下，中國和日本雖然在經貿關係上往來密切，進出口貿易額也不斷上升。然而，兩國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不但沒有深化，反而因為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加深彼此的不信任。（馬場公彥，2014：207-208）日本人民對於中國的看法，會對於日本政府在與中國互動時的外交決策有所影響。有鑒於人民觀感在外交政策當中的重要性，日本人何以對中國負面情感居高不下，自然成為中日關係中必須思考的問題。本文依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當中的國際關係題組，嘗試捕捉日本民眾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透過調查資料當中的呈現，得以一窺認知因素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扮演何種角色。欲掌握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勢必不能忽略對於認知資訊的理解。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壹、日本學界看待中國崛起


八〇年代的日本經濟強盛，甚至出現「日本第一」的說法。然而，九〇年代卻因為泡沫經濟的破滅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氣。相對於日本經濟景氣的低迷，中國則從 1992 年以來便維持超過百分之十的高經濟成長率。一般認為，



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友秀於 1990 年五月號的《諸君》雜誌上所發表之題為「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的文章，為日本「中國威脅論」的濫觴。村井友秀從國力的角度切入，認為「中國」無論是國土面積、人口、天然資源以及軍事力量等方面，都是一個有巨大潛力的國家。（何思慎，2001：7-9）

與村井友秀的思考脈絡相類似，日本政府也從軍事安全角度應對中國崛起。日本政府於 1993 年推出「新防衛大綱計畫」，且於 1996、1997 年分別發表「美日安保聯合宣言」和「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李靜旻、徐斯勤，2008：84）此外，許多日本學者同樣從經濟和軍事等實力面的角度論述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軍隊的川島弘三，表示中國武力擴張後將以日本為主要敵人。（川島弘三，1990）飯田將史關注中國經濟成長同時所發展之海洋戰略，在預算增加的情況下，可以想見海軍的近代化是必然的發展方向。（飯田將史，2013）船橋洋一則認為隨著中國向海洋發展的動向，勢必與強調航行自由的日本等國發生衝突。面對中國可能破壞和平現狀的擔憂，日本應強化美日同盟。為了維持區域穩定和平，美日同盟應發揮更大的角色。（船橋洋一，1998：190-199）

除了實力快速增加所帶來的威脅感，專制威權的政治體制也使許多日本學者在論述中國崛起時抱持更多疑慮。茅原郁生認為，中國威脅論主要來自國防經費的急速增加與其內容的不透明性。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因而對於中國行使軍事能力的意圖有著心理上的擔憂。中國威脅論述除了是對於中國的巨大潛力感到不安之外，增強軍事能力之內含的不確定性也是威脅感的重要面向。（茅原郁生，1998：251-252；天兒慧編著，1997：46-50）船橋洋一主張，雖然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承擔重要角色，但是中國最大的弱點在於其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以及權力繼承制度的不明確。（船橋洋一，1998：198）平松茂雄在分析中國軍力現代化所帶來的威脅時，以中國為獨裁國家為由，表明更高程度的擔憂。由於中國共產黨一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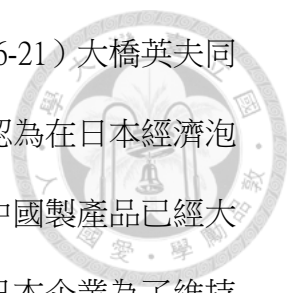


獨大，可以透過政治權力將資源集中於特定領域的發展。（平松茂雄，1999）樋渡由美以美日同盟該如何對應的角度談論中國崛起，將中國崛起視為對東亞穩定帶來不確定性的一項因素。雖說其認為經濟力和軍事力的增強並不必然與對外侵略的意圖劃上等號，但仍然相當強調必須確認中國的意圖。（樋渡由美，2003）馬場公彥也主張，對日本而言，強大的中國是近代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存在。在中國崛起、日本停滯、美國衰退的時代背景之下，周邊國家對中國有更強的威脅感。其威脅感一方面來自中國實質力量的增強，一方面來自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馬場公彥，2014：210-211）

相對於政治、軍事、經濟等物質層面的討論，阿久津博康則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中日之間敵對的狀態。其認為即使中國民主化，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仍然不會消逝。尤其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必定訴諸民族主義，不斷喚起一般大眾對於日本侵略的歷史記憶。（Hiroyasu AKUTSU, 2005）尤其自從江澤民上台後，反日愛國教育的實施更為徹底，例如於1994年所制定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要綱」等等。（蘇俊斌，2012：19）1989年至1998年這段時期，可以說奠定了中日之間彼此互相負面看待的基礎。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緩解國內人民對於統治的不滿，而塑造日本的敵人形象。自九〇年代開始，不斷地強調中國對日抗戰的歷史，因而造就了中國國內對於日本的負面觀感。（上村威，2015：72-76）淺野亮也將中國民族主義列為雙邊關係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認為中國經濟高度成長強化多數中國人的自信心，而有增強中國民族主義的傾向。中國民族主義高漲造成周邊國家的不安，基於軍事爭端可能性的增加，因而將中國軍力現代化之發展解讀為中國威脅。（天兒慧編著，1997：91-94）



在眾多中國威脅論相關的討論之中，相對於將中國斷定為威脅的看法，也有學者不認為崛起的中國必然會成為威脅，或者從日本自身的角度出發，不認為萌生中國威脅論述的因素全然來自中國。中居良文肯定中國的發展潛力，但是同時也指出幅員遼闊的中國有自身糧食、人口和環境等潛在發展問題必須面對。相對於把環境問題視為中國發展的負擔，戶崎肇則認為與中國相距不遠的日本可能受到來自中國環境問題的威脅。在中國經濟急速發展的同時，空氣、水質污染以及森林破壞等問題漸漸浮上檯面，從防衛角度而言日本必須作出相應的準備。（天兒慧編著，1997：105-109、317-319）同樣著眼於中國環境問題，卻導出截然不同結論，可以看出日本學者在分析中國崛起呈現相左的意見。此外，在肯定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的同時，對其發展抱持較為保守態度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天兒慧從歷史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基於自身歷史脈絡而有潛在大國意識，並在各方面實力崛起同時引發各界廣泛討論之大國論述，然而快速發展同時所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和環境生態破壞可能會動搖人民自身定位和認知。（天兒慧，2013：166-169）高木誠一郎則同意的確會因為不確定性而擔心中國帶來的危險，但不該直接斷定其為威脅，否則容易落入自我實現的預言。（朝日新聞シンポジウム，2005）國分良成也認為不該反覆談中國威脅論，因為此舉助長中國的民族主義傾向，等同為日本樹立敵人。（夏冰，1997：188-196）山室信一則認為中國威脅論的出現其實來自日本自身的停滯，以中國作為一種他者的認識當中，甚至還隱藏著期待中國崩潰的曲折心理。（李靜旻、徐斯勤，2008：92-93）中國崛起初期對日本而言是經濟的機會，來自兩國經濟上的互補性。當時，中國擁有廉價勞力和天然資源，日本則具有高科技技術。兩國在經濟互補的情況下，度過外交上的蜜月時期。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兩國逐漸從互補走向競爭關係。德重昌志和日高克平便認為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一直是日本海外投資的重點，卻在日本國內經濟不



振之後被視作日本產業空洞化之重要原因。(蘇俊斌, 2012: 16-21) 大橋英夫同樣以日本自身發展的角度, 解釋中國威脅論的出現與消逝。其認為在日本經濟泡沫化之後, 對中國製商品的需求快速上升, 到了九〇年代後半中國製產品已經大量向日本輸出。在許多領域, 中國製產品皆滲透至日本市場, 日本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紛紛移轉海外。因此, 中國經濟的崛起被認為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原因之一。另外, 具有通貨緊縮問題的日本面臨廉價中國製商品, 其緊縮情形更加惡化。在此種情況下, 九〇年代後半中國威脅論的論述漸漸從政治軍事領域擴展至經濟領域。然而, 時至 2001 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 中國反而成為支撐日本長期景氣好轉的存在, 中國威脅論便消失無蹤。(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2012: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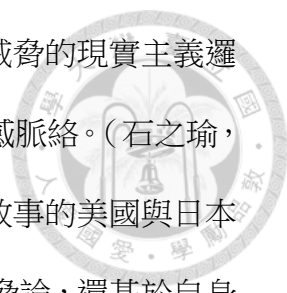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 在既有研究中, 多數日本學者傾向將中國崛起解讀為對日本的威脅。而此種「中國威脅論」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分別為實力擴張層面、威權政體層面和民族主義層面。實力擴張層面主要關注中國軍事力和經濟力的快速提升, 認為一個崛起強權在實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後必定有向外侵略、破壞既有權力平衡的傾向。而威權政體層面擔心社會主義政權會威脅民主國家, 主要關心中國崛起後欲何去何從的意圖, 以及政權延續的穩定性。由於專制獨裁國家缺乏國內其他機構及民意的監督制衡, 再加上選出繼任者的制度不明確, 使日本學者產生對於中國未來發展不確定性的擔憂。民族主義層面則從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出發, 對於中日關係的前景抱持悲觀和謹慎的態度。日本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 主要從宏觀角度出發, 在國際體系中將日本視為一個整體, 以分析日本如何面對中國崛起。不可否認學界論述必然會以各種媒體管道影響日本一般民眾的觀感, 因而前述觀點同樣可以視作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一部分。然而, 日本一般

民眾或許存在些許與菁英階層觀點的差異。因此，後續文獻檢閱將著眼於國家內部的日本人民對於中國看法之相關研究。



## 貳、日本人看待中國

關於日本人中國觀的討論，既有研究相當豐富。馬場公彥搜集大量日本論壇和雜誌媒體界的資料，完整論述自 1945 年日本戰敗至 1992 年天皇訪中，此一期間發生的歷史事件以及日本論壇的觀點和解讀。石曉軍以中日兩國從古至今相互認識的觀點出發，論述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古代日本一方面學習來自中國的文化，一方面感受到來自先進文化的壓力，因而存在憧憬崇拜與危機感並存的中國觀。隨著日本進入幕府時代，漸漸強調日本自主性，對中國呈現越來越批判的態度。近代以後，日本的發展超越中國，甚至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對中觀感轉而走向輕蔑。（石曉軍，1992：101-159）近代以後的日本中國觀，邵軒磊以冷戰前後期分析日本面對中國威脅之差異。冷戰時由於東西陣營的意識型態對立，在國際權力體系上，中國被納入蘇聯的勢力圈中，而日本則被置於美國影響之下。因此，對當時的日本而言，中國象徵社會主義的實踐代表。若是論及當時日本對中國所抱持的威脅感，則是表現在對於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滲透的可能。後冷戰時期，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包含歷史、民族主義、領土與軍事，以及文明論的途徑。基於日本獨有的華夷秩序觀之周邊民族精神結構，日本容易落於身份認同上的混淆。（邵軒磊，2012：90-100）對於日本面對中國的思想，既有研究同樣多有著述。吳光輝認為日本的中國形象複雜而多樣，其主要可以歸結為三項內涵，分別為作為文化帝國、作為文明比較對象以及作為文化他者的中國形象。（吳光輝，2010：12-13）石之瑜探究中國崛起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基礎上，如何能夠獲得理解



的問題。其認為雖然中國崛起在語言表達上是一種日本感受到威脅的現實主義邏輯，然而語言無法傳達的是中國崛起此一印象所牽動的複雜情感脈絡。（石之瑜，2006：27）延續此一思考，李靜旻和徐斯勤將有大量中國威脅敘事的美國與日本的知識界作為比較對象，日本知識界除了最早正式提出中國威脅論，還基於自身發展歷史，提出中國威脅論的考量角度與美國知識界有所差異。其認為隨著日本經濟快速起飛至泡沫經濟的破滅，再對照中國的崛起，造成思想界負面情感的深化，中國威脅的論述因而浮上檯面。（李靜旻、徐斯勤，2008：92）

相對於思想方面的研究，實證研究上則大多依賴各式各樣的民意調查資料，以掌握日本一般民眾對於中國的看法。日本社會對中國經歷多次認知上的轉變，歷經戰後敵對走向友好，又再次走向競爭關係的變化。甲午戰爭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社會普遍對中國抱持侮蔑感和優越感，二戰後則改以美國的中國認識為主軸。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日本大眾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雖然不高，但基於文化上的親近、二戰侵略的負罪感以及經貿上的依賴等因素，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敵意遠不及來自蘇聯威脅的感受。在中日建交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日本大眾對於中國的認識趨於好轉。1972 年田中角榮首相確定訪中行程後，日本大眾輿論首次出現戰後以來喜歡中國人比例高於討厭中國人的比例。（黃大慧，2000：259-260）然而，日本人對中好感卻又因為天安門事件而惡化，其後慢慢回溫的關係也再次因為中國核試爆以及釣魚臺等問題走下坡。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將近八成的日本人對中國感覺友好。然而，1989 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驟降為五成，最終於 1996 年出現外交輿論調查首次「對中不親近感」(51.3%) 高於「對中親近感」(45%) 的比例。（國分良成等，1997：181-182）2004 年之後，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正負面觀感比例開始出現明顯高低差距。特別是 2010 年中日漁船在釣魚台發生衝突後，對中親近感跌落

至 26.3 %，不親近感則升至 77.8 %。（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2：246-247）

魯義以多項輿論調查分別檢視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狀態，並以案例分析的方式進一步頗析兩國認識的差異。在改革開放之初，中日之間友好的浪潮包含「熊貓熱」、「家電熱」、「留學熱」等等。然而，八〇年代之後情況逐漸出現變化。從 1982 年的教科書事件開始，1996 年發生台海危機，到 2001 年小泉出任日本首相後引起的靖國神社參拜爭議，中日關係不斷動盪，並牽動著兩國民眾之間的相互認識。（魯義，2006：34-37）該書囊括二十八項民意調查數據，既能同時兼顧中日雙方的看法，又能涵蓋 1982 年至 2002 年整整歷時二十年的變遷。然而，受限於其本身立場，書中不免存在歌頌中國的主觀論述。再加上該著作出版之時，中日兩國尚未進入白熱化的競爭態勢，因而較無針對中國崛起甚至中國威脅的日本人觀點。

除了以全面民意調查為主要的研究，也有學者針對日本菁英階層的學生進行對中觀感的研究。園田茂人以 2008 年和 2013 年所分別實施的亞洲學生調查為依據，考察亞洲各國菁英大學生對於中國崛起的認識、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變化、中國對自己國家影響以及中國對自身職涯發展的影響。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日本菁英大學生普遍將中國崛起視為威脅而非機會，而且認為無論中國影響力如何擴張仍難以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此外，對於前往中國留學興趣缺缺，主要原因來自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以及言論自由受限制的擔憂。由此可知，體認到中國崛起與菁英大學生自身職涯規劃之間仍有相當的落差。（園田茂人，2014）

綜上所述，既存研究中以全體日本民眾角度分析中國的實證研究為數不多。在少數的研究中，部分僅著眼於特定日本人民。即使以全民為分析對象，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後所進行的調查和論述，缺乏更為近期的資料呈現。2017 年 Yun-

han Chu 和 Yu-tzung Chang 所發表的東亞地區人民認知研究，對於東亞地區人民看待中國崛起方式有了初步的掌握。本文欲延續該研究，以同樣的調查資料為基礎，試圖進一步分析日本人民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



### 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文作為 Yun-han Chu 和 Yu-tzung Chang 的東亞人民認知後續研究，同樣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第三波和第四波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由國立臺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所執行，在整合性的研究架構下，針對東亞地區的政體轉型與民主化等等，進行跨國性的比較調查研究。自 2001 年計畫開始，時至 2018 年為止已經完成四波調查，總共涵蓋亞洲 14 個國家地區。

在 Yun-han Chu 和 Yu-tzung Chang 的研究當中，同時呈現東亞地區民眾對於美國和中國兩大強權的看法，以說明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認知變化。美國自冷戰時期以來，除了駐軍而在政治軍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之外，經濟上也是亞洲各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長期作為美國在亞洲堅定的盟友角色。在中國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動搖了過去由美國主導的東亞國際秩序。

根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和第四波的調查資料，在東亞十四個國家地區當中，日本是對於中國區域正面影響認知最低的國家。此外，日本作為東亞雁行秩序經濟發展經驗的領頭者，在美中勢力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有著耐人尋味的心理機制變化。因此，本研究特別著眼於在東亞國際秩序處於特殊位置的日本，



進行深入分析探討。延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卷設計架構，本文同樣以對於美國和中國的看法，意即以面對東亞地區既有強權和新興強權的認知對比，進行日本人民看法的頗析。

綜上所述，本研究資料來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的第三波和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在資料分析中，先以敘述統計呈現資料整體架構以及依變項內容，再以單變數關係檢視自變項是否對其具有影響力，最後以序數邏輯斯迴歸模型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計算自變項和控制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程度。在統計檢定中，使用的統計軟體為 Stata14 和 IBM SPSS Statistics 22。

##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預計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闡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既有文獻之回顧、研究資料與方法以及章節安排。第二章為本文之理論與研究假設，羅列在國際關係中影響認知的因素，並將其置於中日關係的框架下加以討論。第三章為本文之研究設計，說明如何將前一章的理論概念，操作化為調查資料中的題組，以進行變項之間的影响評估。第四章為實證分析和結果討論，以統計模型呈現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並論述實證分析結果與深入討論。第五章為本文之結論，討論中日關係發展走向，並進一步論及相關研究之未來展望。

## 第二章 研究假設



在國際政治中，影響一國人民看待他國的因素相當多元。本文在回顧既有文獻後，歸結出政治、經濟，以及民族主義三種面向的因素。接著，將上述三者分別置於中日關係的框架之下，探討其以何種方式影響日本人民看待中國崛起。

### 第一節 國際關係中的影響認知因素

在國際關係理論當中，主要可以分別從現實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學派和建構主義學派角度出發解釋國際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作為當中的行為者，由於難以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因而透過追求權力的方式，保障自身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行為主義思潮的影響，開始追求如同自然科學一般的研究方式。以客觀中立的研究方法，尋找國際互動中的普遍性法則。在此種浪潮下，國際關係引進體系和結構的概念。Kenneth Waltz 便是嘗試以科學方法運用於國際關係，據此對於現實主義提出修正。以 Kenneth Waltz 為首的新現實主義學派，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主導著當中的國家行為者。新現實主義排除各國內部的差異，以國家之間權力大小分配所形成的不同國際體系結構，歸因國家的行為傾向。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冷戰期間，與現實主義學派分庭抗禮的是自由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推崇民主制度，經濟上則鼓勵自由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因此相信在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配合之下能給予個人最大程度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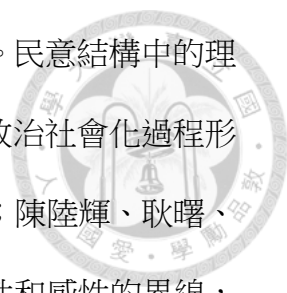
自由，進而產生最適切的分配結果。延續自由主義思潮的新自由主義，又被稱作自由制度主義，主要結合功能主義中世界經貿互賴的概念。在新自由主義概念之下，國家之間會基於經濟貿易的互利因素走向合作。



相對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主張無政府狀態的結構是先驗的存在，社會建構主義挑戰了國際體系的實質內涵。除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注重的物質性因素，建構主義提出非物質層面的觀念因素重要性。對於建構主義而言，物質因素固然重要，然而由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和實踐所構成的認知因素同樣具有主導性。國家之間互動的身份和位置會造就不斷變化的國際體系，並重新形塑國家的利益和行為。

根據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在全球化貿易互賴加深的情況下，國家基於絕對利益的追求，有共同合作的誘因。在此一思考脈絡之下，中日韓作為東亞主要國家且為重要經貿合作夥伴，按理說應該具備相當強烈的合作動機。2017年，中日韓三國間的貿易總額將近 6700 億美元，人員往來超過 2800 萬人次。（新華網，2018）然而，在經貿交流日益深化之下，中日韓三國並沒有單獨組成一個緊密的合作組織。由此可知，除了經濟利益之外，仍有其他因素影響著國家之間的互動。以中日之間的互動而言，日本人對中觀感的惡化便成為雙方友好合作的可能阻礙之一。在中日韓各國內部的民意環境如何看待另外兩個國家，是值得各國政治領導人正視的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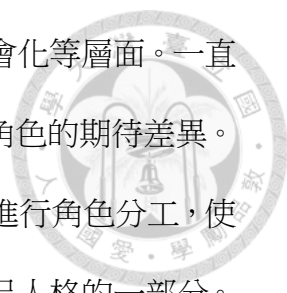
在兩岸關係研究當中，針對經濟利益和心理認同等不同面向的民眾心裡糾結的討論相當豐富。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開放的立場，一直都是研究者關心的課題。理解民眾的決策傾向，能夠對於政治生活有更完整的掌握。由於兩岸經貿開放不僅牽涉單純的經濟利益，更牽動兩岸之間的歷史記憶和台灣民眾的認同問題，因而發展出理性和感性的討論框架。兩岸關係政冷經熱的狀況與中日關係有所類



似，因此本文試著將此一討論框架應用於中日關係的分析當中。民意結構中的理性與感性，包含基於理性自立所做的經濟理性選擇，以及經由政治社會化過程形成具有個人情感成分的態度。（陳映男、耿曙、陳陸輝，2016；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置於中日關係的框架之下，雖無法徹底劃分理性和感性的界線，但仍然可以依循情感和非情感面因素，歸結出政治體制、經濟，以及民族主義層面的影響因素。

除了上述三者影響人民認知的重要因素之外，在政治學研究中對於個人政治態度的形成也有許多相關研究。個人政治態度作為個人內部持續運作的系統，包含認知、情感和行動三個組成部分，主導著個人認知。此一態度結構為社會大眾所擁有，並以一種長期的方式持續存在。社會態度為一個團體內部的人所共享，因而隸屬同一團體的個人往往共享類似的態度和價值觀。然而團體內部成員態度不盡然相同，源於每個人的個人特質而有態度上的差異。（原田唯司，1985：328；Fred N. Kerlinger, 1984：7-8）

而如何形塑個人態度的影響因素，主要牽涉個人所屬社會群體，以及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所接收的資訊。性別此一分類，往往在政治態度研究中被列為分析政治態度的指標之一。一般認為，男性比女性更為關心政治事務，且男性大多支持軍事方面較為強硬的政策，而女性則有較關心社會方面和平等權利的傾向。然而，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對於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程度較高，針對此一爭論學界並無一致的看法。有論者認為女性有較為保守的傾向，但也有學者指出事實上男性相較於女性抱持更加保守的態度。（Fred I. Greenstein, 1961；原田唯司，1985：331；Felicia Pratto & Lisa M. Stallworth & Jim Sidanius, 1997；Kevin Marjoribanks, 2006）




性別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包含政治參與、政治態度和社會化等層面。一直以來的研究，將這些性別導致的差異歸因於，各文化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差異。由於社會既定成規預設了不同性別有所差異，並預期以此差異進行角色分工，使得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漸漸習得社會期待，而將其內化成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

(John Dearden, 1974)

除了性別之外，無論是在民主還是非民主國家，年齡被廣泛認為對於政治態度和行為有重要影響，包含投票行為、政治利益和政治效能感等等。主要原因有兩種解釋，其一為生命週期理論，其二為世代理論。前者主張隨著年齡變化，人們想法會有固定的變動傾向，例如隨著年紀漸增想法趨於保守等等。後者則認為不同世代會基於所經歷的時代背景，而習得該世代特有的思維，形成截然不同的認知觀點。(Bobert Harmel & Yeh Yao-Yuan, 2015 : 214)

另外，政黨傾向因素往往與年齡因素相伴發生，同時對政治行為和態度有重要影響。一般認為，政黨傾向受到自己家庭上一代影響深，且大多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變動的可能性並不高。以投票行為而言，年輕世代的投票者對於新事件的反應較大，相較之下年長世代的政治態度大多有一致性而少有變動可能。此一現象除了與年齡因素有關之外，也與政治相關知識獲取量多寡有所相關。(Philip E. Converse, 1969 : 142)

如前所述，政治相關知識獲取量多寡以及對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也是形塑個人政治態度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認為，對於政治程度關心程度越低，有越趨於保守政治態度的傾向，反之則有較支持改革的態度傾向。因此，與知識獲取有所相關的教育程度，也被認為是主導個人政治態度的因素之一。學校作為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影響著個人取得知識的管道以及面對知識的態度。(原田唯司，1985 : 332)



關於人民態度和行為的政治文化研究，強調一致性的概念。在一致性理論當中，除了政治、社會、經濟不同面向之間的連結之外，最重要的是公民價值與制度結構之間的一致性。Russell J. Dalton 與 Doh Chull Shin 主張，人們具有與自身所處政治體制價值一致的政治傾向。（Russell J. Dalton & Doh Chull Shin, 2006：5-13、264-273）基於目前大多數國家採用民主體制，並且被普遍認為是較好的制度，民主作為個人基本價值系統的一環，影響著民主國家內部人民對於非民主國家的觀感。

中國崛起的現象，被認為對於既有全球秩序帶來衝擊與轉型。而此一變化之所以備受爭議討論，Jeffrey Henderson 認為是源於中國具有與美國以及世界上多數國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國政府的權力完全由中國共產黨所把持，採取威權和壓迫的統治方式。在威權體制之下，中國社會缺乏能夠制衡政府所作所為的公民社會力量。（Jeffrey Henderson, 2008：378-379）因此，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體制差異影響了其他國家對於中國的認知。

在政治因素上，影響認知的因素主要包含實力擴張以及建制差異。在日本學界對於中國威脅的討論中，提及中國近年來快速的軍事和經濟成長可能使其成為日本的競爭對手。然而，可以發現日本學者大多會同時考量中國的威權政體因素。意即，中國之所以使日本以及周邊國家感到威脅，不僅僅來自實力上升，更重要的是實力增長後的意圖，主要來自威權體制的不透明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本文在政治因素的考量上主要關注體制差異的部分。

相對於政治方面，經濟因素同樣主導著一國人民對他國的認識。與政治因素相類似，一國實力擴張容易被他國解讀成為威脅。而實力擴張同時包含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增強，因此經濟無疑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除了帶來威脅的可能，經濟因素也同時可能加深兩國之間緊密的連結。日益加深的貿易互賴，既有加強友

好關係的機會，也有強化敵意的可能。中國經濟崛起既有威脅論也有機遇論，便可理解經濟因素可能對於認知有正面或是負面影響。

耿曙在兩岸關係研究中提及，經濟治略為國家之間相互施加影響力的手段之一。其中包含正面酬賞和負面施罰兩種影響方式，由此可知大眾對於他國的經濟影響可能同時存在正負面不同觀感。Huang Min-hua 和 Chu Yun-han 便在亞洲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觀感研究中指出，雖然預設人民會基於與中國的緊密經濟連結而對中國抱持好感，但是卻在實證研究中得出相反的結果，與中國貿易關係越緊密的國家反而對中國好感度越低。不論經濟對於人民觀感的影響為正面還是負面，經濟因素的確很大程度影響一國人民對於他國的認知。（耿曙，2009：4-5、Huang Min-hua & Chu Yun-han, 2015：427-429）

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國際社會當中行為者之間的往來交流不斷增加，形成高度的合作互賴關係。對於國家而言，生存仍然是首要考量目標，因而軍事力量依然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面向。然而，隨著國家間彼此影響程度日益加深，有越來越多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其中包含經濟和環境等面向。在不同領域的國家互動過程中，軍事力量不見得永遠是適合達成目標的最佳手段。由此可以得知，全球化之下經濟要素對於國家之間互動影響的重要性。（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2001：24）

除了政治和經濟因素，民族主義情感也在人民認知中扮演重要角色。民族主義依賴情感訴求，並強調歸屬於某一個國家的感覺，往往在一群人鄙視或抗爭某假想敵的情況下興起。（Roskin, Michael G.,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and Walter S. Jones，劉后安、洪聖斐譯，2002：116-117）Brian C. Rathbun 在中國人對美國態度的研究中指出，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傾向可能阻礙中美關係的發展。中國民族主義不僅強化了對自身國家的高度忠誠，同時帶來對於其他國家的不信任

和厭惡，尤其是針對最著名且與中國有頻繁往來互動的美國。（Alastair Iain Johnston. & Mingming Shen. eds., 2015：10）由此可知，民族主義情感牽動著一國人民對於主要來往國家的觀感認知。



在日本學界討論中國威脅的文獻中，部分學者論及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才是導致中日敵對狀態難以消解的原因。由此可知，民族主義影響一國人民對他國認知的方式，不僅包含自己國內的民族主義，同時可能來自對方國家民族主義的牽動。雖然不可排除他國民族主義情感有影響國內民族主義發酵的可能，然而本文主要以日本人民為分析對象，因而著重於日本人民自身感受的討論。

綜上所述，社會建構主義重新將認知因素帶回國際關係領域的討論之中。而以兩岸關係為借鏡，可以知道在人民認知包含基於理性自立所做的選擇，以及個人情感層面的態度。本文在爬梳國際關係中影響認知的多元因素之後，試著沿用兩岸關係的討論框架。儘管無法徹底劃分理性和感性的界線，但仍然可以依循情感和非情感層面的分類，歸結出政治體制、經濟，以及民族主義三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章節後續分析將三項因素分別置於中日關係的框架下進行深入討論。

## 第二節 中日關係中的體制差異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在美國佔領之下制定憲法，確立了走向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雖然日本從 1955 年至 1993 年為止，由自由民主黨長期掌握政權，但在 2009 年民主黨上台後，被廣泛認為實現了有意義的政黨輪替，並鞏固了日本的民主制度。固然自 2012 年野田佳彥首相下台之後，日本的在野黨勢力逐漸



式微，然而並不影響民主制度在日本所具備的正當性。由《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可知，在民主正當性相關題組內容中，有將近九成五的受訪者同意民主制度雖然有些問題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制度，反映出民主體制在日本社會受到高度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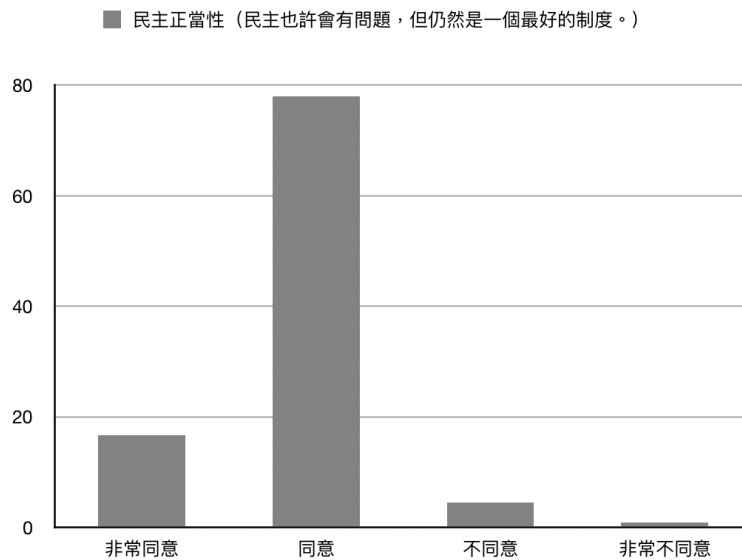



圖 2-1：日本人民對於民主正當性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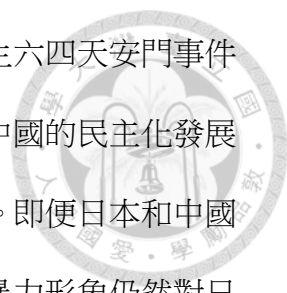
(筆者製圖。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

相對於日本在二次大戰後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中國隸屬於蘇聯主導的共產主義陣營。冷戰期間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主要是在美蘇兩強權對抗之下，因此日本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以美國作為參考點。冷戰初期在日本存在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表現在對於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滲透的恐懼之上。到了後冷戰時期，日本才以自身歷史文化脈絡出發，以更多元的角度看待中國。(邵軒磊，2012：90-98) 即使如此，過去基於意識型態對抗所抱持的負面觀感，仍然可以在當今中國威脅的論述中窺見其蹤跡。



回顧日本學界對於中國威脅的討論，中國的專制威權政治體制使許多日本學者對於中國崛起抱持疑慮。茅原郁生、船橋洋一、平松茂雄等人皆指出中國軍力的現代化以及軍費的逐年增加之所以令其感到擔憂，主要來自中國獨裁體制帶來意圖的不透明和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由此可知，在中國非民主體制與日本民主體制相異的情況之下，影響著日本方面看待中國崛起的視角。

相對於世界上多數國家所行之民主制度，中國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走向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獨裁體制。回顧近代中國發展歷史，若干條件構成了當前中國共產黨獨裁治理的政治環境。首先，1949年中國共產黨甫成立之際，中國尚處於半殖民地狀態。對於當時農村為主文化發展水平不高的中國而言，需要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帶領全國走向近代化發展，而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回應了時代所需。再者，中國自帝制時代以來便有菁英強權治理的政治文化傳統，因而助長了毛澤東得以執行個人獨裁的政治氛圍。最後，由革命和戰爭所交織而成的時代環境，形成長期政黨政治缺位的政治文化。在經歷內戰後國民黨的撤退，中國本土並無能夠與中國共產黨並駕齊驅的反對勢力。以蘇聯共產黨為學習對象的中國共產黨，效法其嚴密組織架構，建立以黨為中心的一黨專政體制。中國共產黨作為新中國唯一的統治政黨，不允許其他政黨勢力的存在，以確保其在中樞地位，並強力主張其在中國社會所扮演之領導性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和挑戰。在近代化民主浪潮和社會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分別在1976年和1989年爆發兩次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當中的血腥鎮壓場面，對於民主和和平意識深植人心的戰後日本而言無疑是顆震撼彈。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外務省在發言中表達憂慮和遺憾之情，雖然不像西方國家對於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仍然做出凍結部分經濟合作的決定。（小島朋之，1999：35-38）



由前述日本內閣府所實施的外交輿論調查可知，在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友好觀感驟降。此一現象除了反映出中國的民主化發展有其波動性，也說明了此一波動會連帶影響日本人的對中觀感。即便日本和中國在八〇年代處於經濟上互補的合作狀態，天安門事件所呈現的暴力形象仍然對日本人看待中國帶來相當大程度的負面衝擊。因此，可以推論中國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發展程度，在日本人對中態度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面對天安門事件的態度差異之上，可以窺見日本與中國有著特別緊密的依存性關係。地理位置上的相鄰，與歷史文化的相近，再加上經濟互利，即使對於中國政治作為上的不認同，日本也無法斷然與中國作出徹底切割並對其進行經濟制裁。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才能為日本提供安定的亞洲秩序。而由獨裁體制所帶來的政治不安定要素，始終帶給日本一種深層的不安和擔憂。

### 第三節 中日關係中的經濟因素

自 1972 年中日建交以來，雙邊關係經歷多次的起伏。八〇年代初期中日關係蜜月期間，雙方不僅經濟上呈現互補關係，政治上的關係也相當友好。進入九〇年代以後，歷史教科書爭議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越演越烈，屢次引發中日之間外交爭端。歷史問題雖使雙方交往產生齟齬，然而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雙方大多採取互相節制的姿態，避免衝突升高影響區域穩定和經濟發展。

1985 年和 1996 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和橋本龍太郎首相分別皆曾基於國家利益考量，決定不再參拜靖國神社。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日本也是首先取消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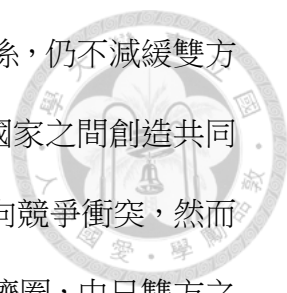
中經濟制裁的國家。由此可知，儘管歷史問題造成中日兩國政治上的齟齬，但經濟上的互利能夠促使雙方避免衝突，並拉近兩者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九〇年代末期政治上走向緊張和競爭的關係，中日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則更加緊密。1996 年至 2006 年，日本對中貿易上升 239%。自 2007 年開始，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對中國貿易出口的增加，使日本能夠從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經濟不景氣中恢復，並成為支撐日本長期景氣好轉的存在。（蘇俊斌，2012：21、Evan S. Medeiros，李柏彥譯，2011，135-139、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2：104）

中日之間的經貿合作關係，不僅在雙邊關係上往來密切，在區域經貿整合的面向上也有強化合作的趨勢。1997 年中國、日本、韓國受到東南亞國協之邀請，於東協領袖會議後召開共同高峰會，被稱作第一次「東協加三」高峰會。其後，除了每年定期舉辦高峰會之外，中國、日本、韓國更於 2003 年簽署具有政治約束力的「促進三方合作共同宣言」，以提升環境保護、能源及災害預防等領域的合作。（黃奎博，2005：98-102）

相對於經濟上互補關係以及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中國和日本在政治上的互動則稱不上熱絡。以高層領導人的互訪為例，2001 年小泉首相就任以後，雖然曾經三次訪問中國，但皆為私人訪問之形式。小泉首相雖然曾與胡錦濤主席以及溫家寶總理會面，但皆是在中日兩國以外的地區進行會晤。2003 年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高達一千兩百億美元，然而由於靖國神社參拜等政治議題，而導致雙方領導人並沒有相互訪問的行程。（小島朋之，2005：135）

學界常以政冷經熱來形容中日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見經濟要素在雙邊關係中處於和政治關係同樣重要的位置。對日本而言，雖然在地緣政治上與中國呈現對立的態勢，卻在全球經濟緊密連結之下不可避免地要與中國交往合作。因此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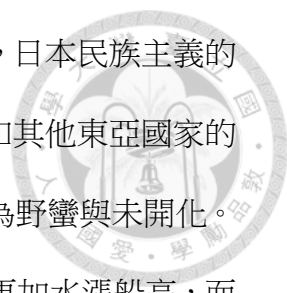
兩國在政治上如何對立，甚至在軍事上面臨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仍不減緩雙方持續加深的經貿合作關係。根據新自由主義觀點，經濟互賴為國家之間創造共同利益，因而提供國家之間合作的誘因。中日兩國即使政治上走向競爭衝突，然而受制於持續增長的雙邊經濟關係，以及持續走向整合的東亞經濟圈，中日雙方之間依然存在維持友好關係的誘因。由此可知，經濟因素在雙邊關係上具有重大影響力，因而在形塑日本人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上佔有一席之地。

## 第四節 中日關係中的民族主義因素

中國和日本同處於東亞區域，彼此之間互動的歷史源遠流長。基於古代中國文化較為先進，因此東亞地區形成以中國為軸心的冊封體制。無論日本是否被置於中國的朝貢體制之下，日本皆以一種文化後進者的姿態從中國輸入先進文化。在古代的中日互動之下，中國始終以一種天朝的心態自居，日本則始終以面對中國的心態來認識自己。此種根本立場的不同，讓中國沒有深入了解日本的需求，日本卻必須關照中國的一舉一動。

隨著歷史進程的演變，日本自武士政權時代開始，越來越體察中國的不足之處，而漸漸萌生中國並非處處先進的意識，甚至企圖進軍中國，取代中國在東亞的地位。到了江戶時期，隨著國學派的發展，日本日益強調自主性，並對於中國抱持越來越批判的態度。（石曉軍，1992：131-159）此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可以說奠定日本擺脫中國的思考基礎。

明治時代時期，在福澤諭吉等人脫亞入歐的論述之下，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政策。此一時期在日本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在歐美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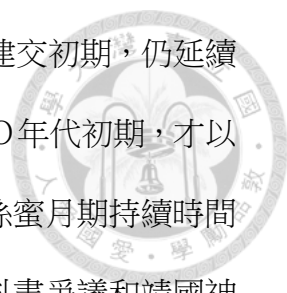


義和亞洲主義對抗之下所形成的產物。在確立文明標準的同時，日本民族主義的思維漸漸膨脹。以納入西方西伐利亞體系之下與否，區分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地位。日本將自身視作文明之國，而將中華民族和朝鮮民族視為野蠻與未開化。甲午戰爭之後，隨著日本現代化的發展，日本民族主義的意識更加水漲船高，而此種民族優越感便主要建立於對中國和韓國的輕蔑態度之上。此種態度進而發展成為對於亞洲其他國家的侵略意圖，可以從明治政府內部所出現的「征韓論」以及台灣牡丹社事件等作為一覽無遺。（上山春平，1965：76；鍾准，2010：34）

在日本國內膨脹的民族主義，很大程度影響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在亞洲地區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戰敗後，美國為了杜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對日本政治社會進行徹底改造。美國為日本所制訂的和平憲法，限制了日本武裝能力的發展，使得日本必須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日本一轉而成為美國在東亞最堅定的盟友。

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也包含中日戰爭的戰敗。然而，對多數日本人而言的戰爭歷史經驗，較多聯想到的是 1941 年之後日美開戰之後的太平洋戰爭。其主要原因來自與美國開戰後日本本土多處受到轟炸，因而有較深的受害印象。因此，相較於敗給美國的記憶，輸給中國的戰敗意識在多數國民心中是較為薄弱的存在。（馬場公彥，2010：63）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經驗，冷戰時期日本看待中國相當大程度受到美國的影響。冷戰時期東西兩陣營抱持對立的意識型態，而中日兩國分別隸屬於蘇聯和美國陣營之下。在此一格局之下，中日之間較無直接互動。因此，對當時的日本而言，中國象徵社會主義的實踐代表。（邵軒磊，2012：90）一直要到 1972 年，日本和中國才打破二十七年的斷交狀態，重新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自 1972 年中日兩國正式建交以來，雙邊關係有起有落。建交初期，仍延續過去並無太多政治上互動的狀態。直到中國改革開放，甚至八〇年代初期，才以領導人的友好關係為象徵進入雙邊關係蜜月期。然而，中日關係蜜月期持續時間並不長久。九〇年代以後，依據過去戰爭歷史所引發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漸漸浮上檯面，屢次引發中日之間外交爭端，甚至持續至今。

當前中日關係的惡化，與兩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程度的相關。鄭永年認為，中國崛起和日本相對衰退分別在兩國國內以不同方式激化了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中國方面，國家實力快速發展帶來自信，帶動民族主義的興起。而日本方面，自明治維新開始以居於亞洲各國之上而生的民族自豪感，隨著中國崛起受到挑戰。許多日本人面對此種局勢變化感到挫折，因而對於中國崛起產生威脅感。（鄭永年，2007：169-170）以國家認同角度而言，日本方面欲重拾自身大國認同，中國方面欲建立受害者認同。而民族主義因素在其中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加劇了雙方在歷史認識上的衝突。

由於本文以日本人想法為關注焦點，因而著重日本內部的民族主義傾向。由前述回顧可知，日本與中美兩國的互動歷史截然不同。在中日關係之中，彼此互動歷史源遠流長，在日本人民心中由崇敬與輕蔑等複雜情感交織而成對中國的認識。反觀美日關係，相對於中日關係的發展歷史並不算太長，但其複雜情感卻也不亞於中日關係。自十九世紀才開始接觸的美國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走向對立，卻在戰後成為堅定的軍事合作盟友。在與中國和美國互動的過程，皆牽動著日本人民心中日本該有樣子的期待，進而形塑日本的民族主義樣貌。尤其是在中國崛起之後，作為原本東亞主導角色的日本，直接面臨區域秩序翻轉的衝擊。受到環境影響而牽動的個人心理變化，一定程度影響著日本人民心中對於中國的認知。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成長快速。在成為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同時，也在參與各個國際組織的過程中，漸漸走向政治和外交上的大國。所謂的中國崛起，其實包含外交、軍事、經濟和軟實力等面向的實力增長。外交上，中國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開始積極參與多邊國際組織，以求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參與議程設定及行使話語權。軍事上，自 1990 年代起國防預算一直維持高度支出以及高度成長率。僅次於美國的高度軍事支出，使其他國家質疑中國的戰略意圖。經濟上，以自身勞動力和能源的優勢，成為出口眾多產品的世界工廠。此外，基於基礎建設等經濟發展需求，也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鋼鐵和石油等原料的輸入國。除了上述層面的影響力，由「北京共識」一詞的出現，可以看出中國在軟實力方面同樣有所提升。「北京共識」相對於「華盛頓共識」，主要指稱在威權政治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的結合下，達到經濟高度發展的統治模式。在中國崛起的眾多面向當中，本文特別側重軟實力的部分，以人民看待中國崛起為分析主軸。

Joseph Nye 在觀察冷戰期間東西雙方互動之後，首先將國家實力進行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區分。由 Joseph Nye 所提出的軟實力概念，點出在評估國際關係中的權力時，科技、教育、經濟等無形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Joseph Nye, 1990：179）過去受到最多研究者關注的軍事能力，固然是組成國家權力的重要部分。然而，隨著時代演進，權力內涵獲得更加多元的詮釋。在國際政治的互動中，議程設定等無形力量的運作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無論是作為既有世界霸主的美國，還是崛起強權的中國，軟實力方面的競爭必然是不可忽視的面向。Joseph Nye




曾於 2005 年時撰文指出中國在亞洲之軟實力正在快速增加，呼籲美國應當作出相應準備。然而根據 Joseph Nye 的分析，其認為中國固然在文化上有吸引力，但由於學術自由受到限制以及政治腐敗等問題，其軟實力資源相較於歐美國家仍相對受限。（Young Nam Cho & Jong Ho Jeong, 2008：454）

如前所述，中國崛起在國際政治許多面向皆具備廣泛的影響力，而本文側重軟實力方面。為了衡量中國的軟實力，延續使用同樣調查資料的既有研究，本文從日本人民觀點角度進行對於中國崛起看法的分析。本章節首先闡明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資料來源以及將延續何種研究架構，接著說明將軟實力概念操作化之後的研究變項測量，最後是所採行之統計方法。

## 第一節 研究資料

本研究資料來源，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的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為主，並以第三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為輔。該調查為國立臺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所進行的一項跨國性調查計畫，由眾多國際組織及十四個亞洲國家共同合作，進行跨國性的比較調查研究。自 2001 年開始第一波調查，大約每四年實施一次，時至 2018 年為止已經完成四波調查。第三波日本調查於 2011 年 11 月進行，第四波日本調查則於 2016 年 3 月進行。

在同樣使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看出該問卷架構存在許多捕捉中國崛起的面向。相對於 Yun-han Chu 和 Yu-tzung Chang 同時呈現東亞地區民眾對於美國和中國兩大強權的看法，以說明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認知變化，Bridget Welsh 和 Alex Chang 以東亞地區民眾對於中國模式的看法，檢視



中國崛起的軟實力面向之一。根據 Bridget Welsh 和 Alex Chang 的研究，日本是東亞地區當中，對於中國模式肯定程度最低的國家，主要原因可能來自日本人民肯定自己國家現有的發展道路。Bridget Welsh 和 Alex Chang 主張，儘管中國在世界舞台展露頭角，但其發展模式並沒有獲得多數東亞國家甚至中國人民本身的青睞。此外，正面看待中國區域影響力的人，有較高的傾向以中國模式作為自己國家發展的榜樣。（Bridget Welsh & Alex Chang, 2015）

誠如 Yun-han Chu 和 Yu-tzung Chang 之研究所示，中國和美國在亞洲地區的競逐態勢呈現白熱化狀態。其競爭態勢的具體實踐，可以從近幾年中國和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爭奪高鐵建案的互動當中一覽無遺。2015 年中國取得印尼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鐵項目，可以說動搖了日本在東南亞的長期優勢。長期以政府開發援助協助東南亞國家進行建設的日本，同時使日本產業得以走入東南亞市場。在中國崛起後，開始與日本一同角逐東南亞市場。中日雙方在各項高鐵建案的拉鋸，反映的是亞洲區域國際秩序的變動。

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日本在國際社會中長期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堅定的盟友。後冷戰時期，美國在亞洲地區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上皆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面對強大美國影響力的日本，因為扮演同樣陣營的盟友角色而安於此一國際秩序。在中國崛起後，挑戰了過去由美國主導的區域秩序。面對此一秩序變動的日本，其所接收到的衝擊可想而知。欲觀察日本人民在區域秩序變動之下的心理狀態，必須同時考慮對於既有強權美國和新興強權中國的看法。

綜上所述，本研究資料來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的第三波和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延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卷設計架構，本文以對於美國和中國的看法，意即以面對東亞地區既有強權和新興強權的認知對比，進行日本人民看法的頗析，以說明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認知變化。

在資料分析中，先以敘述統計呈現資料整體架構以及依變項內容，再以單變數關係檢視自變項是否對其具有影響力，最後以序數邏輯斯迴歸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計算自變項和控制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程度。



## 第二節 變項說明

作為使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後續研究，首先回顧該調查資料所設計之問卷架構。國際關係領域對於中國崛起事實的關注，不僅包含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還有世界各國如何看待的軟實力面向。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也相當重視其他國家如何感知中國崛起後的國家形象。正面的國家形象，有助於國際社會接受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國際環境變化。即便體認到中國在各大領域的影響力漸增，各國人民也不見得肯定此一變動所帶來的效果。由 Joseph Nye 所提出的軟實力概念，便強調了若是中國具備足夠的軟實力，周邊國家便不見得會將中國崛起視作威脅，或者需要圍堵的對象。因此，可以將國際社會看待中國崛起分成若干層次。首先是認知部分，中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崛起實力是否被國際社會所認識，而認定其對於區域具備重大影響力。接著，在體認到崛起事實之上，以何種視角評估此一國際秩序的變動。尤其是對於各國人民而言，中國崛起對於自己國家所可能帶來的正負面影響。最後，展望未來是否認定此一國際秩序變動有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意即，是否預期此一影響力在不遠將來依然存在。（Chu Yunhan & Liu Kang & Huang Min-Hua, 2015；Joseph Nye, 2012）

## 壹、依變項



本研究關注中國崛起背景的軟實力，以「認知」、「評估」、「預期」三個面向，捕捉日本人民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另外，由於人民感受的評估層面是本文特別關注的對象，因而以前述研究假設所推估的可能影響因素，針對評估的變項進一步進行統計分析。認知部份，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調查中國國際關係題組第 163 題依變項；評估部分，以問卷中第 169 題為依變項；預期部份，則以問卷中第 166 題為依變項。各題題目內容及回答如下：

- 第 163 題：請問您認為目前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
  - ◇ 中國。（編碼為 1）
  - ◇ 美國。（編碼為 2）
  - ◇ 日本。（編碼為 3）
  - ◇ 印度。（編碼為 4）
  - ◇ 其他國家。（編碼為 5）
  
- 第 169 題：一般而言，您認為中國對於日本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 ◇ 非常正面。（編碼為 6）
  - ◇ 正面。（編碼為 5）
  - ◇ 稍微正面。（編碼為 4）
  - ◇ 稍微負面。（編碼為 3）
  - ◇ 負面。（編碼為 2）
  - ◇ 非常負面。（編碼為 1）



➤ 第 166 題：未來十年內，您認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

- ◇ 中國。(編碼為 1)
- ◇ 美國。(編碼為 2)
- ◇ 日本。(編碼為 3)
- ◇ 印度。(編碼為 4)
- ◇ 其他國家。(編碼為 5)

另外，延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卷設計架構，並增進對於日本人民看待中國崛起的理解，本研究同時呈現日本人評估美國的視角。將日本人面對東亞地區既有強權以及新興強權的認知評估，兩相比較觀察其中差異。為了比較認知因素的影響差異，僅在依變項部分更動為對美認知評估，自變項部分仍延用本文所關注的三項研究假設。由於在前述認知和預期部份，已包含美國在內，因此僅加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問卷當中第 171 題評估美國對於日本影響的變項。題目內容及回答如下：

➤ 第 171 題：一般而言，您認為美國對於日本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 ◇ 非常正面。(編碼為 6)
- ◇ 正面。(編碼為 5)
- ◇ 稍微正面。(編碼為 4)
- ◇ 稍微負面。(編碼為 3)
- ◇ 負面。(編碼為 2)
- ◇ 非常負面。(編碼為 1)



## 貳、自變項

由前述研究假設可知，在日本人評估中國崛起的可能影響因素中，可以歸結出政治體制差異、經濟以及民族主義因素。因此，本研究欲檢證在既有文獻中，尤其是兩岸關係相關研究，主導人民看法的影響因素，是否同樣在日本人評估中國崛起的看法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了將前述概念操作化成為可觀測的變項，選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問卷當中的幾道題目。體制差異部份，以政權評估題組的第 121 題為自變項。經濟部份，以經濟評估題組的第 3 題為自變項。民族主義部份，以公民身份題組的第 161 題和第 162 題為自變項，將兩題重新編碼並相加之後建構出民族主義變項。各題題目內容及回答如下：

- 第 121 題：您認為現在中國的民主程度為何？
  - ◇ 由 1（完全不民主）至 10（完全民主）的量表。
  
- 第 3 題：您認為未來幾年後，我國經濟的情況會如何？
  - ◇ 好很多。（編碼為 5）
  - ◇ 好一些。（編碼為 4）
  - ◇ 跟目前一樣。（編碼為 3）
  - ◇ 差一些。（編碼為 2）
  - ◇ 差很多。（編碼為 1）
  
- 第 161 題：請問您是否以身為日本人為榮？



- ◇ 非常有此感受。(編碼為 4)
- ◇ 有一定程度此感受。(編碼為 3)
- ◇ 不太有此感受。(編碼為 2)
- ◇ 完全無此感受。(編碼為 1)

➤ 第 162 題：請問若是有機會，您會不會想要移居國外？

- ◇ 非常想移居。(編碼為 1)
- ◇ 想移居。(編碼為 2)
- ◇ 不太想移居。(編碼為 3)
- ◇ 絕對不想移居。(編碼為 4)

另外，為了同時與美國作比較，與評估中國的題組相類似，放入日本人評估美國民主程度的題目。將日本人對中認知以及對美認知兩相比較，在經濟評估和民族主義傾向變數的部分皆可直接沿用。因此，僅新增政治體制差異部份以認知美國民主程度作為自變項。題目內容及回答如下：

➤ 第 122 題：您認為現在美國的民主程度為何？

- ◇ 由 1 (完全不民主) 至 10 (完全民主) 的量表。

## 參、控制變項

由前述研究假設可知，除了本文所關注的三個自變項之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人口統計學變項，以及政黨傾向這些因素皆對於政治態度和行為有重要

影響。因此，在控制變項部分將上述變項一併納入迴歸模型當中。各題題目內容及回答如下：



- 第 SE2 題：性別？
  - ◇ 男。（編碼為 1）
  - ◇ 女。（編碼為 0）
  
- 第 SE3 題：年齡？
  - ◇ 受訪者年齡。
  
- 第 SE5\_1 題：教育程度？
  - ◇ 無正式教育。（編碼為 1）
  - ◇ 小學肄業。（編碼為 2）
  - ◇ 小學畢業。（編碼為 3）
  - ◇ 高職肄業。（編碼為 4）
  - ◇ 高職畢業。（編碼為 5）
  - ◇ 高中肄業。（編碼為 6）
  - ◇ 高中畢業。（編碼為 7）
  - ◇ 大學肄業。（編碼為 8）
  - ◇ 大學畢業。（編碼為 9）
  - ◇ 研究所畢業。（編碼為 10）
  - ◇ 其他。（編碼為 11）





- 第 SE5\_2 題：教育年數？
  - ◇ 受訪者受正規教育之年數。
  
- 第 53 題：請問下列政黨之中何者與您最為接近？
  - ◇ 自由民主黨。（編碼為 1）
  - ◇ 民主黨。（編碼為 2）
  - ◇ 其他政黨。（編碼為 3）
  - ◇ 無任何政黨。（編碼為 4）

### 第三節 統計方法

本研究預計先以敘述統計呈現依變項的內容，接著以卡方檢定和相關性分析檢視各個控制變項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單變數關係，再以序數邏輯斯迴歸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計算自變項和控制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程度。在統計檢定中，使用的統計軟體為 Stata14 和 IBM SPSS Statistics 22。

## 第四章 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中，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新增國際關係題組。

如前所述，問卷調查中衡量中國崛起軟實力包含認知、評估和預期，三者人民觀感的面向。而由於本文特別關注日本人對於中國影響的評估方面，因此首先檢視在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之中，日本人對於中國影響日本的正負面認知是否有所變化。如圖 4-1 所示，自 2011 年至 2016 年，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正負面感受並無劇烈變化，大致上皆以負面認知居多。然而，在些微變化中可以發現，日本民眾的看法似乎出現極端化的現象。相較於第三波資料，第四波當中，選擇「稍微正面」和「稍微負面」的比例微幅下降，其餘感受較為強烈的選項比例皆微幅上升。人民意見的極化，使得形塑意見的因素更加值得被關注。因此，本研究主要以第四波資料作為分析對象，除了是較為新穎的資料，也是社會意見較為分化的時間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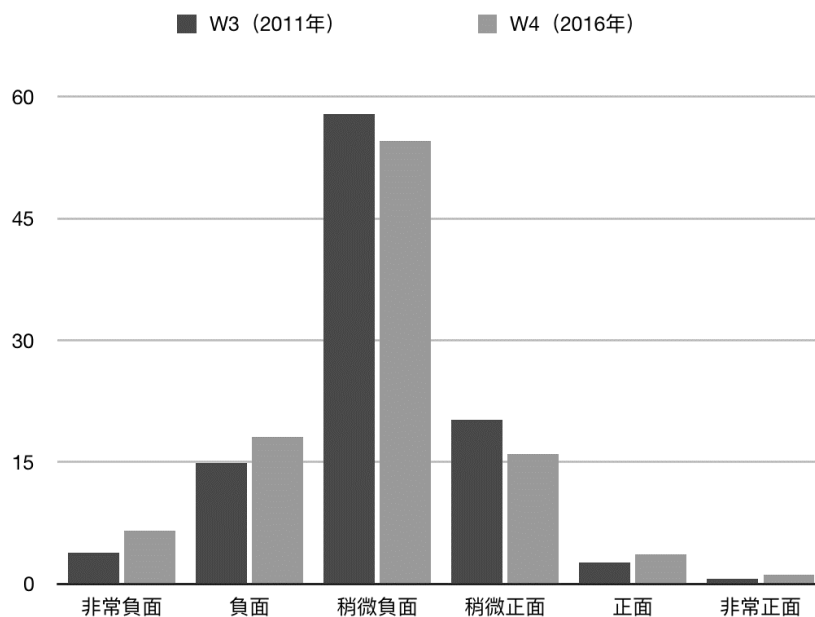


圖 4-1：日本人民對於中國影響日本的正負面認知變化

(筆者製圖。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和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



## 第一節 敘述統計

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中，總共有 1081 個有效樣本數。年齡分佈如圖 4-2 所示，從 20 歲至 96 歲，平均年齡為 53 歲。性別比例如表 4-1 所示，男性佔 48.1%，女性佔 51.9 %。城鄉人口分佈，如表 4-2 所示，91.6 % 人口居住於城市地區，8.4 % 人口居住於鄉村地區，反映出日本都市化程度之高。教育程度則如表 4-3 所示，由分佈可知以高中畢業人口居多數。政黨傾向則如表 4-4 所示，雖然有兩成多的受訪者不願意回答，但在回答者中，有六成多的民眾選擇自由民主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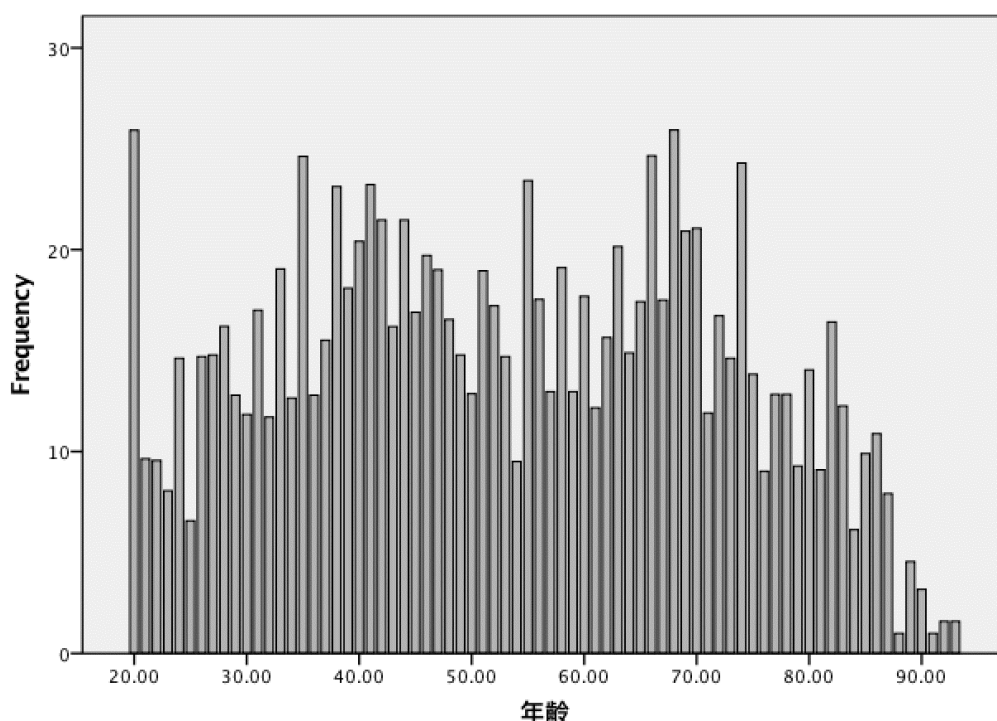


圖 4-2：年齡分佈



表 4-1：性別分佈

性別分佈	男性	女性	總計
次數（個）	520	561	1081
比例（%）	48.10	51.90	100.00

表 4-2：城鄉人口分佈

城鄉分佈	城市	鄉村	總計
次數（個）	990	91	1081
比例（%）	91.58	8.42	100.00

教育程度	無正式教育	小學肄業	小學畢業	高中肄業	高中畢業	大學肄業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總計
次數（個）	3	13	107	20	490	131	268	37	1069
比例（%）	0.28	1.22	10.01	1.87	45.84	12.25	25.07	3.46	100.00

表 4-3：教育程度分佈

表 4-4：政黨傾向分佈

政黨傾向	自由民主黨	民主黨	其他政黨	總計
次數（個）	497	114	158	769
比例（%）	64.63	14.82	20.55	100.00

在理解資料大致結構之後，接著聚焦於本研究所關注的依變項，亦即日本人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本文依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當初設計的架構，將看待分成

認知、評估、預期三個方面。認知和預期方面，如圖 4-3 所示，六成日本人皆認知中國崛起，但仍有將近三成的日本人認為美國才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預期方面，與認知方面結果相同，有六成日本人預期中國崛起。此外，相對於認知當前美國仍然有最有影響力，預期十年後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數大幅減少，轉而對於印度的預期大幅上升。評估方面，如圖 4-4 所示，多數日本人認為中國對日本影響偏向負面，合計將近八成的人負面看待中國崛起。由圖 4-4 可以發現將日本人對於中美兩國的影響力評估兩相對比之後，呈現截然不同的態度。相較於有將近八成的日本人認為中國帶來負面影響，卻有合計八成以上的日本人認為美國對日本有正面影響。由此可以看出對日本人而言，由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區域影響力主導性角色為日本人不樂見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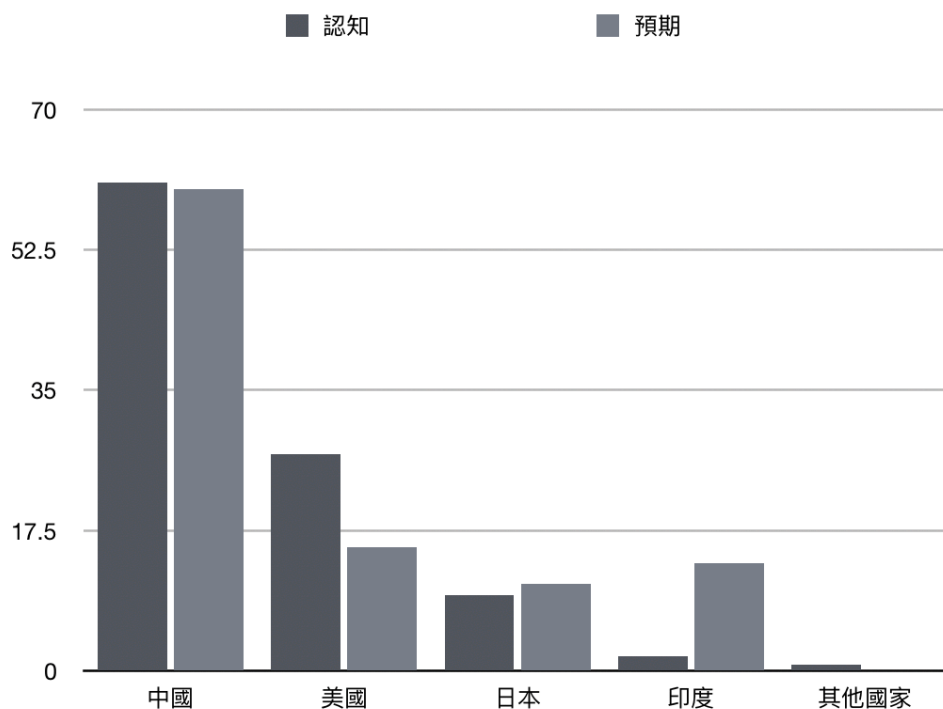


圖 4-3：日本人民認知和預期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筆者製圖。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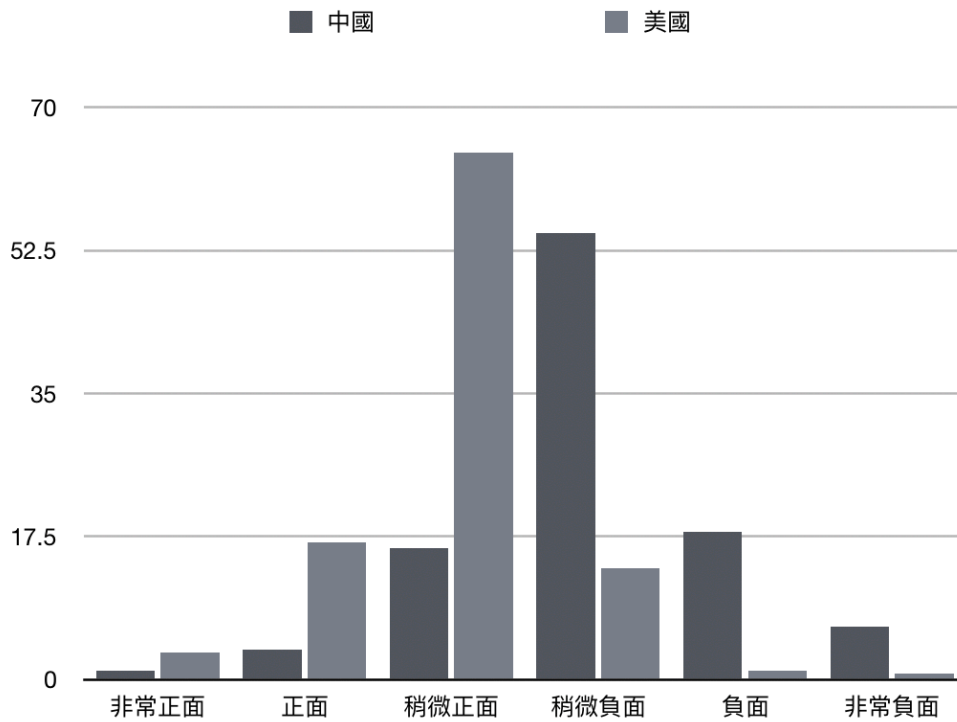


圖 4-4：日本人民評估中國和美國對日本影響

(筆者製圖。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日本地區調查資料。)

## 第二節 單變數關係與迴歸模型

首先，檢視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單變數關係。由於日本人評估中國所帶來影響的變項為序列型變數，因此以相關性分析呈現與自變項之間的單變數關係。由表 4-5 可知，中國民主程度認知和國家經濟前景評估兩個方面皆與對中國看法呈現正向相關，民族主義傾向則呈現負向相關。另外，再以表 4-6 觀察日本人對美國看法是否同樣受到這三項變數的影響。由表 4-6 可知，僅有民主程度認知和國家經濟前景評估兩項有正向的相關性，民族主義傾向則沒有顯著相關性。由此

可知，民族主義傾向此一變數僅在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觀感上有所影響，在對美觀感上並無顯著相關性。



表 4-5：中國對日本影響認知的相關性分析

	中國民主程度認知	國家經濟前景評估	民族主義傾向
Pearson Correlation	0.143	0.155	-0.096
Significance	0.000	0.000	0.003
樣本數	922	938	982

表 4-6：美國對日本影響認知的相關性分析

	美國民主程度認知	國家經濟前景評估	民族主義傾向
Pearson Correlation	0.231	0.158	0.034
Significance	0.000	0.000	0.288
樣本數	925	929	973

接著，以序數邏輯斯迴歸模型探討在控制個人基本特徵的變數下，體制差異認知、經濟前景評估以及民族主義因素是否仍然對於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有所影響。由表 4-7 可知，無論是中國民主程度認知、經濟前景評估，還是民族主義傾向，三者單獨放入迴歸模型當中皆有顯著影響。而將控制變項全數放進迴歸模型中，僅有教育程度對於日本人評估中國影響正負面有所影響，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越抱持正面認知。而在控制性別、年齡、教育年數和政黨的情況下，中國民主程度認知、經濟前景評估、民族主義傾向三者分別依然具有顯著影響。然而，相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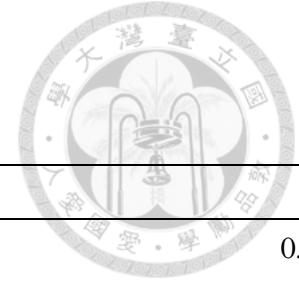
於政治體制差異因素和經濟前景評估，民族主義的影響力相對沒那麼高。最後，將三者同時放入迴歸模型的情況下，民族主義的影響變得較為不顯著，僅剩中國民主程度認知和經濟前景評估對於評估中國態度有所影響。



另外，為了將中國與美國作比較，同樣的迴歸模型結果呈現如表 4-8。與前述單變數關係的結果相類似，單獨放入迴歸模型的情況下，美國民主程度認知和經濟前景評估，在對美影響的評估上有顯著正面影響，民族主義則沒有顯著影響。除了民族主義傾向部份與認知中國影響的結果有所差異，在控制變項的部分也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性別在對中國的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對美國態度上，男性相較於女性對於美國有較為正面的認知。教育程度則不論是在對中國還是對美國的態度上皆有顯著影響，只是對於中國態度正面者是來自教育程度高的人，對於美國態度正面者則是來自教育程度低的人。至於政黨傾向的部分，雖然在對中國的態度上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對美國的態度上則有所不同。相較於非自民黨者，自民黨的支持者對於美國有較為正面的認知。最後，將控制變項和自變項全數放入迴歸模型後，對於美國影響評估有所影響的包含教育程度、美國民主程度和經濟前景評估，且僅有教育年數為負向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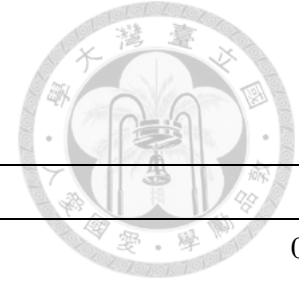


表 4-7：邏輯斯迴歸模型



依變項：中國對日本影響正面程度								
中國民主程度	0.188*** (0.000)				0.238*** (0.000)			0.241*** (0.000)
經濟前景評估		0.333*** (0.000)				0.299*** (0.000)		0.237** (0.006)
民族主義			-0.163** (0.003)				-0.164* (0.013)	-0.136 (0.051)
男性				-0.103 (0.470)	-0.080 (0.585)	-0.139 (0.340)	-0.098 (0.495)	-0.048 (0.750)
年齡				0.005 (0.260)	0.013** (0.007)	0.005 (0.285)	0.007 (0.098)	0.014** (0.005)
教育年數				0.109** (0.001)	0.136*** (0.000)	0.090** (0.006)	0.094** (0.004)	0.110** (0.001)
自由民主黨				0.078 (0.595)	0.124 (0.413)	0.005 (0.971)	0.099 (0.501)	0.082 (0.596)
-2log	171.328*** (0.000)	109.302*** (0.000)	126.608** (0.003)	1683.449* (0.021)	1684.766*** (0.000)	1742.108*** (0.000)	1813.075** (0.006)	1691.551*** (0.000)

表 4-8：邏輯斯迴歸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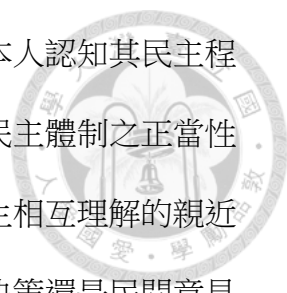
依變項：美國對日本影響正面程度								
中國民主程度	0.233*** (0.000)			0.163*** (0.000)				0.151*** (0.000)
經濟前景評估		0.333*** (0.000)				0.303** (0.001)		0.291** (0.002)
民族主義			0.081 (0.164)				-0.027 (0.702)	-0.026 (0.724)
男性				0.479** (0.002)	0.410* (0.011)	0.454** (0.004)	0.489** (0.002)	0.424* (0.010)
年齡				0.008 (0.087)	0.007 (0.132)	0.008 (0.092)	0.008 (0.084)	0.007 (0.167)
教育年數				-0.075* (0.031)	-0.073* (0.042)	-0.098** (0.006)	-0.076* (0.029)	-0.098** (0.009)
自由民主黨				0.447** (0.006)	0.333* (0.044)	0.410* (0.013)	0.433** (0.008)	0.266 (0.119)
2log	198.881*** (0.000)	112.679*** (0.000)	127.615 (0.175)	1308.768*** (0.000)	1382.905*** (0.000)	1366.321*** (0.000)	1417.228*** (0.000)	1347.330*** (0.000)

### 第三節 結果討論與深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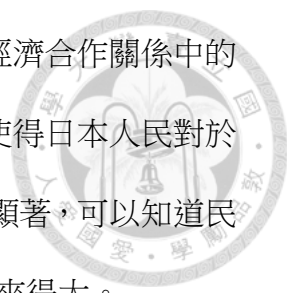
本研究之實證分析分別以敘述統計、單變數關係和迴歸模型，檢視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面向。首先是以敘述統計呈現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認知、評估、預期三個面向；接著針對評估部份，以單變數關係檢視自變項的體制差異認知、經濟評估和民族主義傾向，對於依變項的日本人認知中國正負面是否具有影響；最後延續單變數關係的結果以邏輯斯迴歸模型檢視，體制差異認知、經濟評估和民族主義傾向分別對於日本人評估中國影響具備何種解釋能力。而本研究為了呈現日本人看待中國視角的獨特性，同時比較日本人面對既有強權的美國與崛起強權的中國。除了中美兩強在東亞地區的競逐使得對於兩者的態度值得關注之外，日本受美國影響深遠也使得日本人看待中美兩國有更多元的差異因素存在。

在敘述統計中，包含認知、評估、預期三個面向。認知方面，六成日本人體認到中國作為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意即中國崛起的事實。而相對於認知中國崛起，仍然有三成日本人認為美國才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評估方面，將近八成的日本人負面看待中國崛起，卻有超過八成的日本人正面看待美國對於日本的影响力。此一截然不同的態度，是後續分析著眼於評估部分的主要原因。預期方面，六成日本人預估中國十年後會是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意即中國崛起的前景。相對於看好中國未來發展，僅有一成五的日本人預期美國在未來仍能維持主導性影響力。另外，反而有一成三的日本人看好印度未來發展可能性。由此可知，中國崛起的印象已深植日本人內心，作為既有霸權的美國在人民內心中的地位已漸漸受到動搖。



在單變數關係中，體制差異部份，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日本人認知其民主程度高，與對於該國的正面評估皆有顯著正向相關。由此可知，民主體制之正當性深植日本人心。一方面，與擁有同樣政治體制的國家，容易產生相互理解的親近感。另一方面，民主體制相較於專制獨裁政體，無論是在政府決策還是民間意見層面，皆擁有較高的公開透明性，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資訊取得程度高，降低誤判和互相猜疑的可能性。經濟評估部份，受限於無法直接獲得受訪者自身經濟狀況與中國之間的連結，僅能以國家經濟前景的看法作為替代，以期能間接測量作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帶動日本經濟的影響力對於個人看法的影響。美國同樣作為日本的重要貿易夥伴，預期該經濟要素同樣會在日本人對美國的看法上有所影響。其結果顯示，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個人對於國家未來經濟前景樂觀程度，與對於對象國的正面評估皆有顯著正向關係。民族主義部份，僅在對於中國的態度上有所差異，而且民族主義傾向高以及正面認知呈現顯著的負向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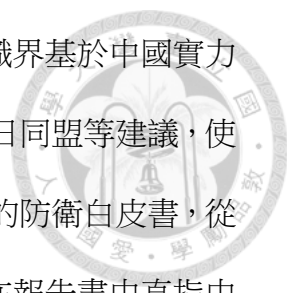
在邏輯斯迴歸模型中，分別以對中國評估和對美國評估為依變項的模型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估計結果與單變數關係大致相同。對於中國的觀感，控制變項中僅有教育程度具有顯著影響，自變項的中國民主程度、經濟前景評估和民族主義三者單獨皆有顯著影響，但在一同放入迴歸模型中之後，民族主義變數變得較為不顯著。教育程度對於中國影響評估為正向影響，意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對於中國影響越有正面的看法。中國民主程度和經濟前景評估兩者為正向影響，而民族主義為負向影響。中國民主程度正向顯著的結果可以分為兩方面加以討論，一方面可以說日本人肯定民主價值，因而對於專制獨裁的體制有較負面的看法；另一方面，日本當前的民主制度，主要來自美國所制定，因而在觀感上必定對於美國有較高的親近感。無論其背後原因來自何者，抑或同時受兩者所牽動，可以斷定對於建制差異的評估確實在日本人的對中國態度上有所影響。經濟前景評估與



評估中國影響有正向關係，意即有可能是受惠於當前中日緊密經濟合作關係中的人對於中國的態度較為正面。由此可知，經濟上的預期獲益會使得日本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提升。民族主義從單獨顯著到在整體模型中較不顯著，可以知道民族主義情緒在評估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上並不如其他兩者的影響來得大。

至於對美國的觀感，在邏輯斯迴歸模型之結果，控制變項的性別、教育程度、政黨傾向三者皆有顯著影響，自變項中僅有美國民主程度、經濟前景評估兩者有顯著影響。性別部份，男性相較於女性對於美國的認知較為正面。教育程度部分為負向影響，意即教育程度越低，對於美國影響評估越正面。政黨傾向部份，相較於其他政黨的支持者，自由民主黨支持者對於美國觀感較好。比起對於中國的評估僅有教育程度有所差別，在對於美國的評估上性別和政黨傾向皆有所影響，可以知道日本人對於中國看法並無太大的歧異度，反而是在對於美國的看法有更為複雜的情緒在其中。從歷史上日本與美國的關係變化而言，便不難理解此一原因。自二戰中相互為敵到戰後形成同盟關係，同盟關係又從不對等演變至合作關係不斷強化，然而軍事上的合作關係並不能避免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美兩國的互動歷史雖不如日中關係來得久遠，日本人對於美國的情感卻有著相當複雜的組成。而在美國民主程度和經濟前景評估部份，同樣對於美國評估認知有正向影響，與對於中國評估概念相類似，民主價值和經濟利益對日本人觀感有正向影響。然而在民族主義部份，對於美國觀感上並無如同對中觀感中有相應的解釋力，可以知道日本民族主義主要針對崛起的中國，對於受到歷史問題困擾的中日關係問題增添較為難以解決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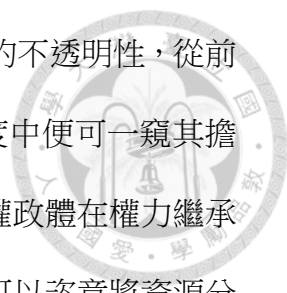
在日本人面對中國的態度上，國際關係三大學派各自在部份面向上具有解釋能力。新現實主義所注重的軍事物質能力，主要體現在日本學界看待中國崛起的觀點之中。自村井友秀首先提出中國威脅論述開始，便是從一國之國力大小加以



判斷中國擁有龐大資源和軍事力量所帶來的發展潛力。日本知識界基於中國實力增長所帶來的威脅感，因而提出日本應在軍事上與美國強化美日同盟等建議，使日本政府同樣以軍事角度關注中國崛起。根據日本官方所公佈的防衛白皮書，從2009年開始特別關注中國在日本近海的軍事活動。2014年則在報告書中直指中國軍事力快速發展，以及中國在南海區域的動作頻頻等等。此外，日本政府也在白皮書當中明白道出，中國的軍事動向加上其內部的不透明性，導致日本對於自身以及區域和平穩定的擔憂。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基於軍事物質能力的快速增長，而對於中國崛起感到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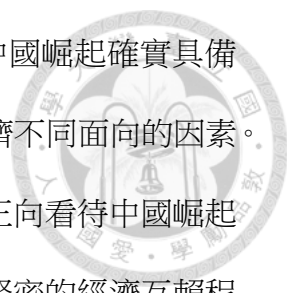
雖然新現實主義角度的論述，主要是在日本政界和學界的意見中被觀察到。然而，菁英階層觀點往往以各種管道方式將其想法傳遞給一般日本人民，進而主導社會中的多數意見。特別是在日本社會，以跟隨多數人意見為依歸的觀念深植人心。在重視大家想法一致性，不鼓勵多元聲音的社會氛圍之下，更難產生相異於社會主流的意見。無論是來自日本學者的著述發言，還是透過媒體得知日本政府強化軍事同盟以及與中國爆發軍事外交衝突的相關資訊，中國實力增長甚至帶來威脅的印象皆可能漸漸感染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觀感。由實證分析當中的結果可以知道，的確在日本人心目中已認知到中國崛起的現狀。雖然無法直接斷定其會將崛起解讀成威脅日本的存在，但在學界以現實主義思維為主導的情況下，容易影響日本整體的對中觀感。誠如 Alexander Wendt 在提出社會建構論時所述，國際政治間之所以會以現實主義的邏輯互相看待，源於現實主義思維深植人心。欲反轉國家之間實力增強所帶來的不信任，必須重視觀念的改變。

內含多元面向的自由主義學派，則是在政治體制差異和經濟因素上對於日本人看待中國具備解釋能力。由實證分析結果可知，認知中國民主程度越高者，對中國越有好感。該結果符合自由主義對於民主制度的推崇，在共享民主價值的前



提之下，民主國家之間有較高的互信程度。面對威權體制國家的不透明性，從前述日本政府發表的防衛白皮書和日本學界論述中國崛起的態度中便可一窺其擔憂。相較於民主政體透過選舉定期選出領導人的輪替制度，威權政體在權力繼承制度上增添許多不確定性。此外，缺乏民意監督的威權政府，可以恣意將資源分配於特定領域的發展。此舉對周邊國家而言，難免對其發展充滿疑慮。在民眾無權對政府課責的情況下，政府內部運作的不透明性淪為常態。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資訊不明確強化了彼此之間的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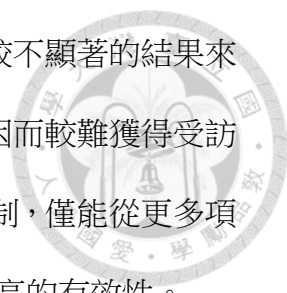
除了自由主義學派當中對於政治體制一致性的肯定，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因素能夠強化國家之間合作的觀點也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中有所體現。根據實證分析所得結果，越樂觀看待國家經濟前景者，對於中國的評估越為正面。固然在本研究中僅能以相當間接的方式衡量經濟因素，而未能掌握個人實際經濟狀況與中國之間的關聯性。但有鑒於中國作為日本的重要貿易夥伴，中國發展對於日本經濟具備相當程度影響力。因此，將對於日本自身經濟前景的評估，推估為對於日本與中國經濟貿易緊密合作情況的評估指標。經過延伸推論，可以將實證分析結果解讀為在中日經貿關係緊密連結的情況下，對於此一情形越為肯定者，對於中國的好感程度越高。意即，受益於日中經貿連結者，會對於中國有較為正面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國家經濟狀況較樂觀看待者，通常是在社會中處於較為優勢地位的人們。而能夠在社會中擁有優勢地位的人，往往以教育程度高者居多。與前述針對教育程度部份的論述相呼應，教育程度高者能夠在掌握足夠資訊後進行較為客觀理性的判斷和分析。因此，之所以能夠觀察到經濟評估因素對於中國認知具有正面影響，很有可能來自受過教育者確實明白中國發展對於日本經濟的貢獻和重要性，而肯定中國崛起帶來的正面效益。



在確認政治體制差異和經濟互賴因素對於日本人民看待中國崛起確實具備影響力後，可以知道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負面觀感包含政治和經濟不同面向的因素。政治上，若是中國有更高的民主化傾向，便能夠給予日本人民正向看待中國崛起的可能性，而較不容易視其構成日本威脅。經濟上，維持當前緊密的經濟互賴程度，甚至更進一步強化雙邊經貿交流，能夠使日本人民感受到中國崛起為其帶來利益進而肯定此一發展走向。然而，自 2012 年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明顯在政治上卻更為極權的道路邁進。尤其是在 2017 年開始其第二任期之後，進一步於 2018 年提出憲法修正案，廢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此一變化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從原本的集體式領導，走向個人主義式領導。意即，權力集中化程度更高。根據日本學界和日本大眾對於威權體制的不信任可以知道，隨著中國走向領導人獨攬大權的局面，勢必強化日本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疑慮。即使雙方經濟上有再深的互利合作誘因，也難以避免由政治體制差異所帶來人民觀感上的惡化和不信任。

相對於現實主義學派和自由主義學派注重物質層面之影響因素，建構主義學派則關注非物質層面的理念因素。由實證分析結果可知，民族主義情感確實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上具有影響，只是在資料呈現中的影響力並不如政治和經濟因素來得顯著。此一結果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討論，一方面可能來自確實在日本人心目中民族主義情緒並不強烈，另一方面則可能來自測量上的限制。若是實際情況較接近前者，可以推論在媒體報導中或是學界論述中提到的民族主義因素，可能有過度誇大的嫌疑。過度強調民族主義因素者，其背後可能存在渲染該情緒的動機。歸咎其動機成因，無非是強化中日之間由歷史問題帶來的對立。以日本國內情況而言，具有右翼思想傾向者抱持該動機的可能性較高。在解讀政治人物言論和新聞媒體論述時，必須特別留意其所聲稱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否和實際日本





人想法之間存在落差。另一方面，若是民族主義因素在實證上較不顯著的結果來自測量上的限制，則可能來自該題目牽涉個人內心深層想法，因而較難獲得受訪者最貼近實際情況的回答。若是欲進一步改善由測量帶來的限制，僅能從更多項的調查訪問中，以更多元角度衡量受訪者想法，以期能達到更高的有效性。

除了民族主義情緒背後所承載的歷史因素特別能夠以建構主義加以解釋之外，人民彼此相互看待所構成的影響力同樣屬於建構主義的範疇。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負面觀感，或許部分來自於中國人看待日本的方式。在中國所爆發的反日遊行等事件，使日本社會普遍意識到被中國敵視的態度。在被對方負面看待的情況下，導致難以產生好感的結果也就不難想像。另外，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相關的討論中皆或多或少帶有部份建構主義色彩。現實主義部份，學界和政界基於中國軍事能力增強所帶來的威脅感，可能透過新聞媒體等管道主導日本一般民眾對於中國的認識。探究日本學者如此評估的原因，可以發現源自國際關係學界在分析國家間互動時，一向以現實主義分析框架為主流。此種觀念的形成，便是建構主義所強調的社會建構過程。自由主義部份，日本人民以民主程度高低作為評估中國影響正負面的判準，說明了日本人民會基於中國發展路線與自己國家發展道路相異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因此，若是以 Alexander Wendt 所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者加以界定，可以說日本人傾向以霍布斯文化的觀點看待中國。日本人基於自身為民主國家的位置，因而不認同中國所行之威權體制。根據身份位置而產生的認同，形塑了日本人的認知。

以兩岸關係理性和感性的討論框架，置於中日關係之下仍然適用。固然難以斷然區分理性和感性的界線，因而以政治經濟和民族主義傾向的分類方式加以討論。在本文關注的變項中，屬於最主要情感因素的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確構成日本人民評估中國影響力的因素之一。然而，相對於政治體制差異和間接潛在經濟

獲益的因素，民族主義傾向因素之影響力有被稀釋的跡象。撇除測量上必然帶來的些許誤差，可以試著推論民族主義因素不若政治經濟面向之因素來得有影響力。因此，對於日本人而言，面對中國崛起此一國際秩序變動，當前的實質利益和安危，或許才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經由前述對於實證分析結果的討論，得知日本國內民眾在看待中國崛起的觀點上，固然以負面看待者居多，但仍然存在內部差異。而分別以國際關係三大理論視角進行分析後，可以知道現實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學派和建構主義學派分別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觀點中具備一定程度的解釋能力。現實主義視角體現在日本對於中國軍事實力增長的威脅感，且此一觀點主要以學界和政界討論居多，合理推測菁英階層觀點由上而下影響了日本大眾對於中國的評估。自由主義視角主要體現在政治體制差異和經濟因素上，無論是日本學界還是一般日本人民，皆會基於中國威權政治體制而有所擔憂。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經濟利益帶來國家間合作誘因，也的確在日本人民的想法中得到驗證。建構主義視角則體現在中日之間基於歷史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在實證分析結果中民族主義因素不如其他因素影響來得大，或許可以推論由歷史問題所引發的人民情感實際上不見得會構成中日關係友好發展的阻礙。中日之間所爭執的歷史認識問題，究竟是普遍存在日本人民心中，還是由部分人士所渲染的議題，是中日關係研究者必須加以辨明的課題。

另外，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中，無論是現實主義學派還是自由主義學派，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觀點分析上，皆與建構主義學派的概念有所關聯。現實主義視角作為國際關係學界主流，主導著日本學界看待中國崛起的看法。自由主義對於民主制度的肯定，影響了日本人民看待中國的觀點。上述兩者背後皆反映出

身份塑造認同，進而決定利益的過程。透過建構主義所提供的多元反思視角，說明了在國際關係的分析中探討認知因素之重要性。



##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中國崛起為背景，並以存在日本的中國威脅論述為研究動機，進而以探究中國崛起的軟實力環境為研究目的。日本除了在威脅論述上有自身獨特的視角，實證研究上也可以發現日本面對中國的特殊性。不僅在日本方面對於中國的認知特別負面，也同時在與其他東亞國家比較的方面，對於中國呈現最為批判的態度。在日本人看待中國此一區塊缺乏實證研究基礎之上，開展全文之研究。

在影響認知的因素中，本文以兩岸關係的分析框架為借鏡，擷取政治、經濟、情感三個層面的角度進行分析。政治部份，以顯而易見的體制差異作為判準。在世界上多數國家為民主國家的情況下，民主的理念和價值普遍在全球各地流竄。中國作為世界上少數的威權國家，必定使其他國家地區人民對其觀感造成影響。經濟部份，隨著中日之間貿易互賴的增加，中國經濟牽動著日本經濟成長的動能。無論是受益於中國帶來的經濟機會，抑或是蒙受相應的經濟衝擊，經濟因素肯定同樣在日本人對於中國看法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受限於研究資料取得限制，本文僅能以對於國家經濟前景的評估間接測量該經濟要素之影響。情感部份，以民族主義情緒作為代表。中日之間源於戰爭經驗和歷史問題所引發的對立情緒，在多次外交衝突中受到激化。而在軍事外交衝突的背景之下，雙方民族主義皆在各種時間點被激化，進而影響面對彼此的觀感。由於本文以觀察日本人民想法為主，因此僅以日本自身的民族主義情緒為觀察對象，然而不可諱言存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扮演催化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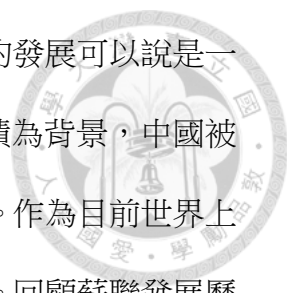
實證研究中，本文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為研究資料來源。在 2011 年第三波和 2016 年第四波調查中所新增之國際關係題組，為觀察東亞地區人民看待

中國崛起提供適當的研究素材。本文延續運用此一調查資料的既有文獻，力圖補足日本人民看待中國視角上的分析。固然受限於問卷設計為適用於跨國之間的比較研究，而難以完全貼近日本本身的情況，但仍然在實證結果中有部份進展。

經由實證分析結果可知，認知中國民主程度、經濟前景評估和民族主義皆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中有所影響，只是程度大小有所不同。在實證分析結果之上，本文進一步以國際關係三大理論視角進行深入探討。在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觀點中，三大理論各自有具備解釋力的領域。現實主義擅於解釋軍事安全，自由主義擅於解釋政治體制差異和經濟因素，建構主義擅於解釋民族主義。此外，現實主義學派和自由主義學派在詮釋上多少帶有部份建構主義色彩，因而凸顯認知形塑過程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力。

## 第一節 中日關係的未來

中國與日本，作為東亞地區的主要大國，始終保持地緣政治上的競爭關係。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區域化整合成為世界的發展趨勢。而在東北亞地區當中，中日之間的關係往往被稱為最麻煩的雙邊關係。中國與日本之間圍繞歷史發展而衍生出的現代外交問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侵華問題、釣魚台問題、台灣問題、歷史教科書事件、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等。儘管存在著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中日之間自 1972 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來，致力於建立互信基礎，為發展友好雙邊關係而努力。對中日兩國而言，穩定的中日關係不僅對彼此國家發展有所幫助，更能對區域和平穩定有所貢獻。



在長久歷史中被稱作大國的中國，於近代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脆弱的大國。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以經濟發展的耀眼成績為背景，中國被認為再次在世界舞台中展露頭角，成為對世界有影響力的大國。作為目前世界上少數奉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免會被與冷戰時期的蘇聯相比較。回顧蘇聯發展歷史，其瓦解的部分原因來自軟實力不足。因此，部分中國學者主張，中國若是欲避免重道覆轍，應當強化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軟實力。即使在軍事能力上能夠與美國相匹敵，然而缺乏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創新能力，其影響力便無法持久。由此可知，其他國家對自身發展認知的軟實力面向，對於崛起中國而言是不可忽略的關注面向。

回顧中日關係發展史，從古代中國隋唐朝時期日本派遣唐使和遣隋使向中國學習，再一直到近代的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向日本學習，可以看出中日兩國彼此之間不斷經歷角色定位的轉換。而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日本看待中國的態度從崇敬到懷疑，再到蔑視。自古代走向近代，中日之間互動框架從以中國為主的華夷秩序走向西方主導的西伐利亞體系。受到西方近代化衝擊的日本，為了使國家走向富強開啟了一系列的改革。對於當時日本的知識份子而言，要回答日本自身定義問題，必須從自己處於亞洲的位置出發，意即以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著手。在處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上，當時日本思想家的主張可以分成脫亞論和興亞論。脫亞論者以福澤諭吉為代表，興亞論者則以東京學派的白鳥庫吉和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為代表。脫亞論認為日本要與中國完全切割，拋棄過去的亞洲文化，加入西方文明國家的行列。興亞論則認為日本應該與中國合作，一同帶領亞洲對抗西方列強的入侵，但在興亞論內部對於中國和日本彼此角色強弱存在意見分歧。雖然各個學派的主張不盡相同，但皆是該時代的知識份子為了解決國家當前問題所嘗試提出的回答。無論是哪一派的主張，皆可以看出日本思想當中作為對照者的中

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日本思想中，始終缺乏以自身為主體的自信，而一直以他者的身份來觀照自己。中國作為一種他者的角色，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

延續近代以來日本思想當中中國角色的重要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冷戰期間，日本知識界對於中國認識的討論從未少過。正是由於日本學界對於中國的重視，才會在中國崛起後的當代引起廣泛討論。對於日本思想界而言，中國崛起象徵的可能不僅僅是鄰國實力增強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尚包括日本思想中該以何種角度處於亞洲和面對世界的困惑。然而，相對於知識份子對於國家定位和角色的思考，日本一般民眾或許更加關心自身生活周遭所帶來的轉變。由日本內閣府所實施的外交輿論調查可以知道，隨著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崛起，日本人民對於中國的不親近感節節升高。若以日本思想界角度出發，奠基於過去歷史文化脈絡的影響，中國崛起對於日本所造成的威脅是更加深層的不安。以國際關係理論加以檢視，知識界的焦慮超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理性主義學派的理解範圍，唯有納入心理學途徑的建構主義才能加以闡釋。相對於學界的看法，日本一般民眾儘管身處同樣的歷史文化脈絡，卻可能在對於中國崛起的觀點中有著部分相左的關注焦點。以兩岸關係為借鏡，可以知道對於民眾而言可能同時存在感性和理性，以及國家整體和個人自身等不同的內心拉鋸和心理糾結。同理，在日本人面對中國的態度上，既有以物質因素為基礎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可以解釋的範疇，也有非物質因素為主的建構主義能夠加以詮釋的領域。

中日之間的關係改善，並不是單一事件解決就能夠達成。雙方除了在政治、經濟、能源多項領域有利害關係之外，以區域政治角度而言，此消彼長的區域地位變化使得雙方之間有著難以用物質因素衡量的複雜情緒埋藏其中。在地緣政治上，中日兩國被迫置於一種矛盾的結構之中，因而難以徹底消彌雙方之間的齟齬。

表面上看似由領土、能源等爭端所引發的外交衝突，其背後所隱藏的可能是崛起中國帶給日本的擔憂和不安。（小島朋之，2005：242-244）



中日關係中，源於戰爭記憶和歷史解釋所引發的外交衝突，容易被視為無法消彌的隔閡。然而，究竟該議題僅為政治上的炒作，還是日本人民內心真正的想法，是訊息接收者必須小心判斷的議題。展望未來的中日關係發展，儘管存在無法抹滅的共同歷史記憶，然而端視行為者對其賦予何種意義，將會得出截然不同的雙邊關係走向。日本人雖然整體而言負面看待中國崛起，但其內部仍是有所差異。由兩岸關係研究所主張的分析框架，置於中日關係之下同樣有能夠加以適用的部分。對於政治體制差異的不信任和經濟利益因素，在民眾看待他國的觀點中扮演重要角色。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針對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內部差異進行剖析，然而受限於資料取得的限制，僅能呈現大致上的傾向，而未能有更細部的分析。像是在中國崛起的討論上，未能區分是中國哪一方面的崛起，可能包含政治軍事或是經濟文化不同層面的影響力。在未來實施的亞洲民主動態第五波調查中，預計將增設此一類型的題目，而對於人民評估國際現勢的看法能有更深入的分析。另外，本研究僅能以經濟前景評估此種相當間接的指標衡量經濟因素對於人民看法的影響，若能在往後研究中取得受訪者自身經濟狀況如何直接受益或是受害於中國影響，將會更加有說服力。最後，本研究資料中亦缺乏日本人實質上是否到過中國，或是與中國人民有何種互動的相關資料，此種接觸對於個人觀感勢必會帶來最為直接的影響



和衝擊。若是能在未來相關研究中，補足更多面向的資料，必定能對於日本人看待中國的視角提供更完整的解釋和論述。

此外，本研究僅著眼於日本自身內部的研究，而未與其他相類似的國家進行比較。在未來研究中，能夠嘗試與東亞區域發展道路相類似的臺灣與韓國進行比較分析。臺灣與中國處於特殊的兩岸關係，既有研究中也從許多政治經濟多元觀點，分析臺灣人民對於中國的態度。韓國與中國之間，則和日中關係同樣有淵遠流長的互動歷史。從古代隸屬於中國的朝貢體制之下，到冷戰時期位於美國陣營之下面對中國，再到如今在美韓同盟的框架中與中國互動。日本與韓國同樣作為美國的東亞的盟友，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既受到美國的影響，也同時受到自身基於地緣政治和歷史記憶的牽動。若能將日本與發展相似的國家進行對中觀點的比較，肯定能夠開展出更多元的研究成果。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

- 王信力，2015，〈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中國大陸與日本在釣魚臺爭端行動的政治診斷〉，《淡江國際與區域研究半年刊》，3(2):101-137。
- 石之瑜，2006，〈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4:27-34。
- 石之瑜、李靜旻，2007，〈斷代與斷裂——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中國大陸研究》，50(1)：9-28。
- 石之瑜、葉紘麟，2006，〈東京學派的漢學脈絡探略：白鳥庫吉的科學主張及其思想基礎〉，《問題與研究》，45(5)：1-16。
- 石曉軍，1992，《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
- 白兆偉，2015，〈從東海防空識別區看中日競逐及台灣因應之道〉，《修平學報》，30:1-32。
- 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李茂興譯，2011，《社會心理學》，新北：揚智文化。譯自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and Robin M. Akert. Social psychology. 2010.
- 吳光輝，2010，《日本的中國形象》，北京：人民。
- 何思慎，2001，〈「中國脅威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義——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2000 年度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歷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  
[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

2f6/274073eeb7d0a1ef49256ab00025bea4/\$FILE/hoszushen.pdf, 2017/7/10。

何思慎，2008，《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臺北：致良。

李圭之，2007，〈在傳統中發現近代：京都學派學者內藤湖南的東洋意識〉，《國家發展研究》，7(1)：121-152。

李柏彥譯，2011，《中共的國際行為：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臺北：史政編譯室。譯自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2009.

李思嫻，2015，〈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11(1):63-80。

李靜旻、徐斯勤，2008，〈一個中國、兩種威脅：美國與日本知識界的文化策略〉，《東亞研究》，39(2):71-110。

邵軒磊，2012，〈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5 (3):85-105。

邵軒磊，2016，〈關係平衡理論與資料庫實證初探—回顧釣魚台事件之中日互動〉，《東亞研究》，47 (1):1-37。

林民旺，2009，〈國內觀眾成本理論與國際合作〉，《教學與研究》，2:81-90。

胡瑞舟，2014，〈北京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之戰略評析〉，《戰略安全研析》，105:39-50。

夏冰，1997，《日本如何面對中國》，香港：明鏡。

徐光國，1996，《社會心理學》，臺北：五南。

陳建民，2009，《兩岸交流與社會發展——「小三通」與旅遊研究文集》，臺



- 北：秀威資訊科技。
- 陳建廷、石之瑜，2007，《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臺北：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
-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兩岸關係與 2008 年臺灣總統大選：認同、利益、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選舉研究》，16(2):1-22。
- 陳映男、耿曙、陳陸輝，2016，〈依違於大我、小我之間：解讀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的心理糾結〉，《臺灣政治學刊》，20(1):1-59。
- 耿曙，2009，〈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48(3): 1-32。
- 張亞中、左正東主編，2011，《國際關係總論》，新北：揚智文化。
- 張登及，2003，《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文化。
- 張滿玲譯，1999，《社會心理學》，臺北：雙葉書廊。譯自 Shelley E. Taylor, Letitia Anne Peplau, and David O. Sears. Social Psychology. 1997.
- 許綏南譯，1997，《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臺北：麥田。譯自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1997.
- 黃大慧，2000，〈日本的公眾輿論與中日關係——以冷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認識為中心〉，蔣立峰主編，《21 世紀的日本：政治外交發展趨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258-269。
- 黃奎博，2005，〈「東協加三」與區域合作：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結〉，《國際關係學報》，20:93-124。
- 游智偉、張登及，2011，〈中國的非洲政策：軟實力與朝貢體系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2(4):111-156。

楊喜慧、陳明通，2016，〈中國發展模式是否成為亞洲國家的學習對象？——一項東亞 13 國民眾的調查〉，《政治學報》，61:1-27。

新華網，2018，〈中日韓貿易：三贏的石頭剪子布結構〉，5/21。

鄭永年，2007，《中國崛起：和諧世界與大國競爭》，臺北：八方文化。

趙建民、何思慎，2004，〈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43(1):83-104。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http://www.asianbarometer.org/>，2018/3/27。

劉后安、洪聖斐譯，2002，《政治學的世界》，臺北：時英。譯自 Michael G. Roskin,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and Walter S. Jones.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1974.

劉承宗，2013，〈日「國有化」釣魚臺群島的影響與分析〉，《藝見學刊》，5:123-136。

劉泰廷、洪銘德，2011，〈後冷戰時期日本對中國崛起之反應：再思權力平衡論〉，《止善》，10:35-50。

魯義，2006，《中日相互理解還有多遠——關於兩國民眾相互認識的比較研究》，北京：世界知識。

韓慧林，2009，〈中共「軟實力」之啟發與作為〉，《國防雜誌》，24(2):70-79。

鍾准，2010，〈中、日、韓近代民族主義歷史認識的形成探析〉，《世界民族》，3:31-38。

蘇俊斌，2012，〈中國崛起後的日本對中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8(2):15-34。



## 貳、日文部分

- 川島弘三，1990，《激動する鄧小平後の中国》，東京：第一企画出版。
- 川島弘三，1990，《社会主義の軍隊》，東京：講談社。
- 小島朋之，1999，《現代中国の政治：その理論と実践》，東京：慶應義塾大学。
- 小島朋之，2005，《崛起する中国：日本はどう中国と向き合うのか？》，東京：芦書房。
- 上山春平，1965，《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至誠堂。
- 上村威，2015，《文化と国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構築：関係と中国外交》，東京：勁草書房。
- 天児慧編著，1997，《中国は脅威か》，東京：勁草書房。
- 天児慧，2013，《日中対立：習近平の中国をよむ》，東京：筑摩書房。
- 日本防衛省，2009，〈平成 21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9/2009/index.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9/2009/index.html)，2018/7/6。
- 日本防衛省，2010，〈平成 22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0/2010/index.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0/2010/index.html)，2018/7/6。
- 日本防衛省，2011，〈平成 23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1/2011/index.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1/2011/index.html)，2018/7/6。
- 日本防衛省，2012，〈平成 24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2/2012/index.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2/2012/index.html)，2018/7/6。
- 日本防衛省，2013，〈平成 25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3/2013/index.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3/2013/index.html)，2018/7/6。



日本防衛省，2014，〈平成 26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w2014\\_00.htm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w2014_00.html)，2018/7/6。

日本防衛省，2015，〈平成 27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w2015\\_00.html](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w2015_00.html)，2018/7/6。

日本防衛省，2016，〈平成 28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w2016\\_00.html](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w2016_00.html)，2018/7/6。

日本防衛省，2017，〈平成 29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7/w2017\\_00.html](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7/w2017_00.html)，2018/7/6。

日本内閣府，2017，〈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2018/3/18。

中居良文編著，2009，《台頭する中国の対外関係》，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田中国夫，1964，《日本人の社会的態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東京：誠信書房。

平松茂雄，1999，《中国の軍事力》，東京：文藝春秋。

平松茂雄，2000，《中国軍現代化と国防経済》，東京：勁草書房。

江藤名保子，2014，《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のなかの日本：「愛国主義」の変容と歴史認識問題》，東京：勁草書房。

茅原郁生，1998，《安全保障から見た中国：日中共存・共栄に向けた視角》，東京：勁草書房。

松本健一，2006，《日・中・韓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東アジア共同体への道》，東京：第三文明社。

秋葉英則，1968，〈政治意識に関する発達的研究〉，《大阪教育大学紀要》，IV(17):73-81。

秋葉英則，1969，〈政治的社會化に関する一研究——青年期を中心として——〉，〈教育心理学研究〉，17(4):229-236。

浅野亮，1999，〈茅原郁生著『安全保障から見た中国』〉，〈アジア研究〉，45(2):81-88。

原田唯司，1985，〈政治的態度の構造と政治的関心，政治的知識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大学生の場合——〉，〈教育心理学研究〉，33(4):327-335。

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2，〈日米中関係の中長期的展望〉，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Japan\\_US\\_China/AllReports.pdf](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Japan_US_China/AllReports.pdf)，  
2017/8/4。

馬場公彦，2010，〈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東京：新曜社。

馬場公彦，2014，〈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東京：新曜社。

國分良成編著，1997，〈日本・アメリカ・中国——強調へのシナリオ〉，東京：株式会社ティビーエス・ブリタニカ。

船橋洋一，1998，〈同盟を考える——国々の生き方〉，東京：岩波書店。

朝日新聞シンポジウム「中国の台頭と日米同盟」，2005，  
<http://www.asahi.com/sympo/1129/>，2018/3/15。

飯田将史，2013，〈海洋へ膨張する中国：強硬化する共産党と人民解放軍〉，東京：角川マガジズ。

飽戸弘，1966，〈政治的態度の構造に関する研究〉，〈心理学研究〉，37(4):204-218。

園田茂人，2014，〈中国の台頭は脅威か、チャンスか — アジア学生調査第



2 波調査の結果を読み解く ― 〉，《セミナー年報》，179-194。  
樋渡由美，2003，〈「中国の台頭」と同盟理論〉，《社会科学研究》，54(2):77-  
100。



## 参、西文部分

- AKUTSU, Hiroyasu. 2005.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be Anti-Japanese Even After Democratization." in [http://www.glocom.org/debates/20050428\\_akutsu\\_china/](http://www.glocom.org/debates/20050428_akutsu_china/). Latest update 15 March 2018.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Mingming Shen. eds. 2015.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In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ecurityPerceptions\\_final.pdf](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ecurityPerceptions_final.pdf) Latest update 23 May 2018.
- Baum, M. A. 2004. "Going Private Public Opinion, Presidential Rhetoric,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udience Costs in US Foreign Policy Cris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5): 603-631.
- Chengxin, Pan. 2004. "The "China Threat" in American Self-Imaginati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Other as Power Politics." *Alternatives* 29(3):305-331.
- Converse, Philip E.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Critical Review*; Winter; 2006, 18: 1-74.
- Converse, Philip E. 1969.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 139-171.

- 
- Courmont, Barthelemy. 2013. “What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Soft Power: Charm Offensive or New Hegemony?” *Pacific focus* 28(3): 343-364.
- Dearden, John. 1974. “Sex-linked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behavi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ir possibly innate origi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13(2): 19-45.
- Greenstein, Fred I. 1961. “Sex-Related Political Differences in Childhood.” *Journal of Politics* 23(2): 353-371.
- Harmel, Bobert. & Yeh Yao-Yuan. 2015. “China’ s Age Cohorts: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6(1): 214-234.
- Henderson, Jeffrey. 2008. “China and global development: towards a Global-Asian Era?” *Contemporary Politics* 14(4): 375-392.
- Hobolt, S. B. & R. Klemmensen. 2005. “Responsive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Preferences in Britain and Denmark.” *Political Studies* 53(2): 379-402.
- Ikenberry, Gilford J.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87(1): 23-37.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 2001.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Longman.
- Kerlinger, Fred N. 1984.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Binghamton, NY: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jphart, Arend.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joribanks, Kevin. 2006. "Sex-related Differences in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a replication." *Educational Studies* 7(1): 1-6.

Min-hua, Huang. & Chu Yun-han. 2015. "The Sway of Geopolitic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why are some Asians more favorable toward China's rise than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3): 421-441.

Mirilovic, Nikola. & Myunghee Kim. 2017. Ideology and Threat Percep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nd Iran. *Political Studies* 65(1): 179-198.

Nye, Joseph S., Jr., 1990.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177-192.

Nye Joseph S., Jr., 2012. "Why China is weak on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8 Jan.

Pratto, Felicia. & Lisa M. Stallworth. & Jim Sidanius. 1997. "The gender gap: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49-68.

Roy, Denny. 2003. "Rising China and U.S. Interests: Inevitable vs. Contingent Hazards." *Orbis* 47(1): 125-137.

Shie, Tamara Renee. 2007. "Ris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Beijing's 'Island Fever' ." *Asian Survey* 47(2): 307-326.

Verba, Sidney. 1961. "Assumptions of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in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14(1): 93-117.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Watts, Meredith W. 1999. "Are There Typical Age Curves in Political Behavior? The 'Age Invariance' Hypothesi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0(3): 477-499.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lsh, Bridget. & Alex Chang. 2015. "Choosing 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a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3): 442-456.

Xinbo, Wu. 2000.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rily Watching One Another." *Asian Survey* 40(2): 296-310.

Young Nam Cho. & Jong Ho Jeong. 2008. "China's Soft Power: Discussions, Resources, and Prospec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8(3): 453-472.

Yun-han, Chu. & Liu Kang. & Huang Min-Hua. 2015. "How East Asians View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3): 398-420.

Yun-han, Chu. & Chang Yu-tzung. 2017. "Battle for Influence: Perceptions in Asia of China and the US." *Global Asia* 12(1): 104-111.

## A. 附錄



### 壹、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的變化

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和第四波的資料相減，可以得出日本人在認知、評估、預期三個方面，分別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有何種變化。首先，如表 A-1 所示，認為當前亞洲最有影響力為中國和美國的比例略減。但其比例差距皆在兩個百分點以內，可以知道日本人認知中國崛起的印象並無太大變化，兩次調查中皆有六成民眾認知到此一國際環境變化。由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從第三波要調查開始才新增國際關係題組，只能得知自 2011 年起已經有過半數的日本民眾認知到中國為亞洲最有影響力之國家。

接著，在評估方面，如表 A-2 所示，自 2011 年至 2016 年，日本人民當中認知中國影響稍微正面和稍微負面的比例些微下降，其他選項皆為上升。相對於表 A-1 之數值變化皆在兩個百分點以內，表 A-2 的變動稍微明顯，但仍在五個百分點之內，可知五年前後日本人的看法大致呈現類似的狀態。從第三波到第四波，無論正負面，回答較為極端的選項有略為增加的趨勢，可以推論在日本人當中對於中國的看法有略為極化的傾向。有較少的日本人選擇中間兩個選項，亦即態度偏好較為溫和的選項。

最後，在預期方面，預期十年後中國在影響最具影響力的比例呈現略為下降的趨勢。相較於五年前有較多的人肯定中國崛起的未來，2016 時有較多的日本人肯定美國和日本將在區域有較大的影響力。即便如此，仍不改變自 2011 年開始就有六成左右人預期中國崛起的看法。整體而言，日本人看待中國崛起在五年間

並沒有太劇烈的變化。無論是認知還是預期方面，皆是六成左右的日本人民肯定中國崛起的現狀和未來。在評估部分，多數日本人皆認為中國對日本帶來負面影響。肯定中國帶來正面影響力者始終僅有二成左右。



表 A-1：日本人民認知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中國	美國	日本	印度	其他國家	總計
2011 年	1164 (62.58%)	512 (27.53%)	145 (7.80%)	29 (1.55%)	10 (0.54%)	1860 (100.00%)
2016 年	619 (60.86%)	275 (27.04%)	96 (9.44%)	19 (1.87%)	8 (0.79%)	1017 (100.00%)
相差比例	-1.72%	-0.49%	1.64%	0.32%	0.25%	0.00%

表 A-2：日本人民評估中國對日本影響

中國對日本影響	非常正面	正面	稍微正面	稍微負面	負面	非常負面	總計
2011 年	11 (0.59%)	49 (2.65%)	373 (20.16%)	1072 (57.95%)	275 (14.87%)	70 (3.78%)	1850 (100.00%)
2016 年	11 (1.11%)	36 (3.64%)	159 (16.08%)	540 (54.60%)	179 (18.10%)	64 (6.47%)	989 (100.00%)
相差比例	0.52%	0.99%	-4.08	-3.35%	3.23%	2.69%	0.00%

表 A-3：日本人民預期十年後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十年後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	中國	美國	日本	印度	其他國家	總計
2011 年	1232 (66.74%)	226 (12.25%)	135 (7.31%)	248 (13.43%)	5 (0.27%)	1846 (100.00%)
2016 年	582 (60.06%)	150 (15.48%)	105 (10.84%)	130 (13.41%)	2 (0.21%)	969 (100.00%)
相差比例	-6.68%	3.23%	3.53%	-0.02%	-0.06%	0.00%

## 貳、控制變項和依變項之單變數關係



由表 A-4 可知，性別在對於中國崛起的評估上並無顯著影響。然而由表 A-5 可知，性別在評估美國影響上有顯著差異。在非常正面和非常負面的選項中，男性的比例皆較高。由此可知，男性在對美國的看法上較為極化，女性則大多選擇稍微正面和稍微負面此種態度較不強烈的選項。

表 A-4：性別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性別 X 中國對日本影響	女性	男性	總計
非常正面	6 (0.6%)	5 (0.5%)	11 (1.1%)
正面	12 (1.2%)	24 (2.4%)	36 (3.6%)
稍微正面	84 (8.5%)	75 (7.6%)	159 (16.1%)
稍微負面	290 (29.3%)	250 (25.3%)	540 (54.6%)
負面	87 (8.8%)	92 (9.3%)	179 (18.1%)
非常負面	27 (2.7%)	37 (3.7%)	64 (6.5%)
總計	506 (51.2%)	483 (48.8%)	989 (100.0%)
Pearson Chi-Square	8.735		
Significance	0.120		

表 A-5：性別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性別 X 美國對日本影響	女性	男性	總計
非常正面	13 (1.3%)	19 (1.9%)	32 (3.3%)
正面	64 (6.5%)	100 (10.2%)	164 (16.7%)
稍微正面	325 (33.1%)	308 (31.4%)	633 (64.5%)
稍微負面	73 (7.4%)	61 (6.2%)	134 (13.7%)
負面	4 (0.4%)	7 (0.7%)	11 (1.1%)
非常負面	2 (0.2%)	5 (0.5%)	7 (0.7%)
總計	481 (49.0%)	500 (51.0%)	981 (100.0%)
Pearson Chi-Square	12.299		
Significance	0.031		

年齡方面，為了進行卡方檢定以十歲為一組，八十歲以上歸類為同一組。由表 A-6 可知，雖然卡方檢定結果各組年齡有顯著差異，但必須注意回答非常正面的人數過少，造成許多欄位不足五個樣本，可能影響統計結果。觀察樣本分佈可以發現，負面看待中國崛起的日本人，以 40 至 69 歲居多。意即，中年者對於中國有較為負面的看法。而由表 A-7 可知，年齡在對美影響的評估上同樣有顯著差異，只是由於回答負面和非常負面的樣本數過少，同樣有許多欄位不足五個樣本，可能影響估計結果。觀察樣本分佈則可以發現，年長者較傾向正面看待美國所帶來的影響。



表 A-6：年齡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年齡 X 中國對日 本影響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99	總計
非常正面	3 (0.3%)	2 (0.2%)	1 (0.1%)	1 (0.1%)	1 (0.1%)	0 (0.0%)	3 (0.3%)	11 (1.1%)
正面	8 (0.8%)	8 (0.8%)	4 (0.4%)	6 (0.6%)	4 (0.4%)	2 (0.2%)	3 (0.3%)	35 (3.5%)
稍微正面	16 (1.6%)	29 (2.9%)	28 (2.8%)	19 (1.9%)	19 (1.9%)	29 (2.9%)	18 (1.8%)	158 (16.0%)
稍微負面	79 (8.0%)	76 (7.7%)	103 (10.4%)	81 (8.2%)	96 (9.7%)	67 (6.8%)	37 (3.8%)	539 (54.7%)
負面	16 (1.6%)	28 (2.8%)	29 (2.9%)	32 (3.2%)	39 (4.0%)	26 (2.6%)	9 (0.9%)	179 (18.2%)
非常負面	3 (0.3%)	13 (1.3%)	13 (1.3%)	10 (1.0%)	14 (1.4%)	5 (0.5%)	6 (0.6%)	64 (6.5%)
總計	125 (12.7%)	156 (15.8%)	178 (18.1%)	149 (15.1%)	173 (17.5%)	129 (13.1%)	76 (7.7%)	986 (100.0%)
Pearson Chi-Square	45.687							
Significance	0.033							

表 A-7：年齡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年齡 X 美國對日 本影響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99	總計
非常正面	8 (0.8%)	3 (0.3%)	4 (0.4%)	7 (0.7%)	4 (0.4%)	2 (0.2%)	5 (0.5%)	33 (3.4%)
正面	23 (2.3%)	23 (2.3%)	24 (2.4%)	20 (2.0%)	25 (2.5%)	28 (2.8%)	21 (2.1%)	164 (16.6%)
稍微正面	81 (8.2%)	92 (9.3%)	121 (12.3%)	96 (9.7%)	119 (12.1%)	76 (7.7%)	49 (5.0%)	634 (64.4%)

稍微負面	16 (1.6%)	33 (3.4%)	27 (2.7%)	19 (1.9%)	21 (2.1%)	18 (1.8%)	0 (0.0%)	134 (13.6%)
負面	0 (0.0%)	0 (0.0%)	4 (0.4%)	2 (0.2%)	2 (0.2%)	2 (0.2%)	2 (0.2%)	12 (1.2%)
非常負面	0 (0.0%)	3 (0.3%)	0 (0.0%)	3 (0.3%)	0 (0.0%)	2 (0.2%)	0 (0.0%)	8 (0.8%)
總計	128 (13.0%)	154 (15.6%)	180 (18.3%)	147 (14.9%)	171 (17.4%)	128 (13.0%)	77 (7.8%)	985 (100.0%)
Pearson Chi-Square	56.781							
Significance	0.002							

教育程度方面，由於小學和國中的樣本數過少，因此將其與高中合併計算。由表 A-8 可知，教育程度在對於中國崛起的評估上有顯著差異。將教育程度以高中以下和大學以上作區分，高教育程度者傾向較正面看待中國崛起，低教育程度者傾向較負面看待中國崛起。而由表 A-9 則可以發現美國的情況與中國完全相反，教育程度高者反而對美國有較負面的認知，教育程度低者則對美國有較正面的認知。

表 A-8：教育程度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教育程度 X 中國對日本影響	高中以下	大學以上	總計
非常正面	4 (0.4%)	7 (0.7%)	11 (1.1%)
正面	12 (1.2%)	24 (2.5%)	36 (3.7%)
稍微正面	62 (6.3%)	94 (9.6%)	156 (15.9%)
稍微負面	246 (25.1%)	288 (29.4%)	534 (54.5%)

負面	94 (9.6%)	84 (8.6%)	178 (18.2%)
非常負面	37 (3.8%)	27 (2.8%)	64 (6.5%)
總計	455 (46.5%)	524 (53.5%)	979 (100.0%)
Pearson Chi-Square	12.006		
Significance	0.035		

表 A-9：教育程度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教育程度 X 美國對日本影響	高中以下	大學以上	總計
非常正面	11 (1.1%)	21 (2.2%)	32 (3.3%)
正面	92 (9.5%)	70 (7.2%)	162 (16.6%)
稍微正面	294 (30.2%)	336 (34.5%)	630 (64.7%)
稍微負面	46 (4.7%)	85 (8.7%)	131 (13.5%)
負面	5 (0.5%)	6 (0.6%)	11 (1.1%)
非常負面	4 (0.4%)	3 (0.3%)	7 (0.7%)
總計	452 (46.5%)	521 (53.5%)	973 (100.0%)
Pearson Chi-Square	15.944		
Significance	0.007		

政黨傾向方面，以 2016 時的自由民主黨和民主黨作為主要分類。由表 A-10 可知，日本人民在政黨傾向因素上對於中國影響評估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如表 A-11 所示，政黨傾向在對美國影響評估上則有所不同。自由民主黨的支持者，對於美國有較為正面的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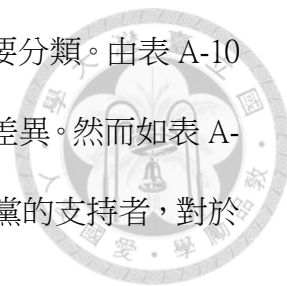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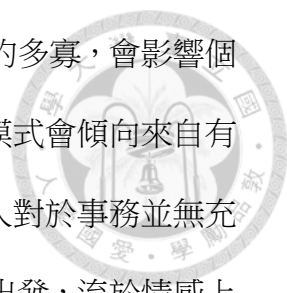
表 A-10：政黨傾向與中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政黨傾向 X 中國對日本影響	自由民主黨	民主黨	其他政黨	總計
非常正面	10 (1.4%)	0 (0.0%)	1 (0.1%)	11 (1.5%)
正面	12 (1.6%)	7 (1.0%)	5 (0.7%)	24 (3.3%)
稍微正面	77 (10.6%)	22 (3.0%)	24 (3.3%)	123 (16.9%)
稍微負面	253 (34.8%)	53 (7.3%)	75 (10.3%)	381 (52.3%)
負面	85 (11.7%)	22 (3.0%)	35 (4.8%)	142 (19.5%)
非常負面	31 (4.3%)	5 (0.7%)	11 (1.5%)	47 (6.5%)
總計	468 (64.3%)	109 (15.0%)	151 (20.7%)	728 (100.0%)
Pearson Chi-Square	11.444			
Significance	0.324			

表 A-11：政黨傾向與美國對日本影響之交叉分析

政黨傾向 X 美國對日本影響	自由民主黨	民主黨	其他政黨	總計
非常正面	17 (2.3%)	2 (0.3%)	5 (0.7%)	24 (3.3%)
正面	94 (13.0%)	20 (2.8%)	16 (2.2%)	130 (17.9%)
稍微正面	300 (41.4%)	70 (9.7%)	91 (12.6%)	461 (63.6%)
稍微負面	60 (8.3%)	14 (1.9%)	25 (3.4%)	99 (13.7%)
負面	1 (0.1%)	2 (0.3%)	4 (0.6%)	7 (1.0%)
非常負面	0 (0.0%)	0 (0.0%)	4 (0.6%)	4 (0.6%)
總計	472 (65.1%)	108 (14.9%)	145 (20.0%)	725 (100.0%)
Pearson Chi-Square	31.963			
Significance	0.000			

在控制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單變數關係影響中，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黨傾向。性別方面，在對中國的評估上並無影響，反而是在對美國的評估上有所差異，男性特別正面和特別負面的比例較女性來得高。年齡方面，無論是在對中國還是對美國的態度上皆有所差異。中年者對於中國有較為負面的觀感，而年長者對於美國有較為正面的觀感。該結果可能來自不同世代成長背景的差異。年長者受到戰後日本依賴美國，雙方關係友好的歷史記憶所影響。中年者則從小到大體驗日本由盛轉衰，中國取而代之的歷程，因而可能對中國抱持較深的敵視態度。教育程度方面，在對中國和對美國的態度上皆有顯著差異。高教育程度者，對中國的認知較為正面，對美國的認知較為負面。反之，教育程度低者對中國認



知負面，而對美國認知正面。其結果主要來自個人資訊獲取量的多寡，會影響個人判斷的依據。當個人擁有越多國際事務相關資訊時，其行為模式會傾向來自邏輯的判斷，較能專注於事件本身而進行分析。相反地，當個人對於事務並無充足資訊時，在決策時只能依賴其他判準，因而容易以自身經驗出發，流於情感上的好惡。（Sidney Verba，1961：100）政黨傾向方面，與對於中國的評估無影響，而是在對美國的評估有所影響。自由民主黨的支持者，對於美國有較為正面的看法，該結果與自由民主黨長期採行較為親美的政策路線相符合。